



錢思亮：事緩則圓

- 157 與大學合作的生化所
- 159 終於抗拒不了三民主義所的籌設
- 163 擴大研究領域：地球所、資訊所和統計所
- 166 逆境中忍辱負重
- 172 「一國兩治」模式的學術外交
- 177 外界對中央研究院的批評
- 183 終於隨經濟發展而起飛：第一個五年計畫
- 192 五年計畫之外的生醫所、分生所和原分所
- 198 積勞成疾、死而後已



錢思亮：事緩則圓



錢思亮於1970年6月4日接任第五任院長後，與前院長王世杰及院內同仁合影。(前排左起：李亦園、邢慕實、錢思亮、王世杰、李濟；後排左起：屈萬里、梁序穆、蔣復璁、那廉君、趙保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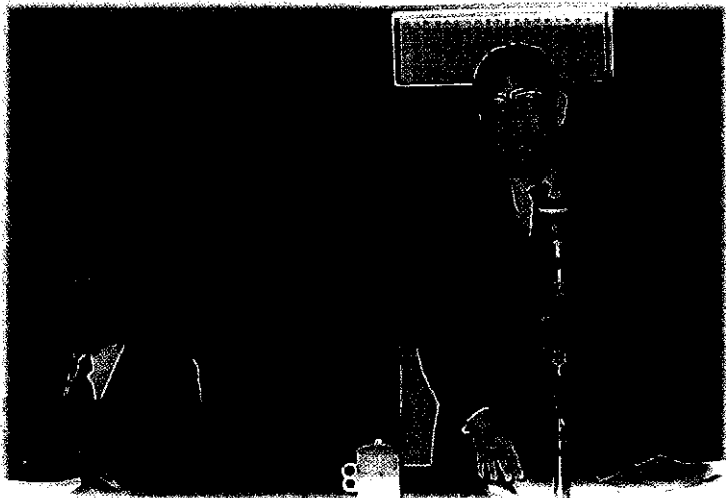
1970年，蔣中正為加強對臺灣大學學生的控制，指派名不孚重望、黨政關係卻密切的閻振興為校長；蔣中正為安排校長錢思亮去處，於是明諷暗示王世杰請辭。¹隨後，評議會推出三位院長人選，第一名就是錢思亮，他的科導會長官吳大猷與同僚閻振興反而均得同票，名列第二和第三。錢思亮原為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到臺灣以後，擔任傅斯年校長的教務長，1950年傅斯年逝世

後，以胡適之力薦，得以接掌臺灣大學，其後二十年一直是臺灣教育界的國子監祭酒。他是清廉自持的教育官僚，木訥寡言，治事謹慎，每天清晨上班起碼五個公事包，每天下班還帶回大批公文卷宗回家批閱。²他處事極為圓融，治事座右銘是「事緩則圓」，遇有棘手的公事，不立即採取行動，讓時間來解決問題。面對權力，他也不會公然對抗，但畢竟出身北京大學，深受蔡元培學術獨立思想的影響，因而總會竭盡所能，暗中阻擋意識形態和黨部組織公然大舉進入文教機構。他擔任二十年的臺大校長時如此，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後，仍然秉持此一原則處理院務，維持中央研究院的學術獨立。

1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8冊，頁166。

2 錢婉孫，〈我的爺爺〉，錢思亮先生治喪委員會編，《錢思亮先生紀念集》(臺北：錢思亮先生治喪委員會，1983)，頁171。

先前評議會選舉院長候選人時，謠言滿天飛，很多人以為當時的政治強人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屬意閻振興，由於當時評議員很多都是政治和教育界的官員，有一些海外院士害怕他們得到暗中指示，或窺伺強人的意思，介入中央研究院院長選舉，所以聯名推薦其他人選，最後錢思亮脫穎而出，才使他們大為放心。錢思亮沒有國民黨黨籍，出任院長後，了解國民黨背景的重要，於是聽由李亦園辭去代理總幹事的職務，另外任命黨政關係良好的臺大法律系教授兼總務長高化臣為新總幹事。高化臣是留日學生，抗戰時期長期追隨國民黨的西北王胡宗南，錢思亮與他毫無因緣，就因為股肱的推薦拔擢他為臺灣大學總務長，後來高化臣到教育部先後擔任梅貽琦部長的總務司司長和閻振興部長的常務次長，也還是留職停薪，虛位以待。高化臣為人清廉自持，做事相當幹練，³但也因為霸氣十足，加上兩人在處理人事和政治判斷方面意見不一，尤其錢思亮院長事必躬親，故不免發生摩擦。高化臣控制不了情緒，曾經十幾次請辭總幹事，錢思亮事緩則圓，則極力加以挽留。很有意思的是，高化臣的辭職信和錢思亮的慰留稿，都是由同一位秘書起草。1982年年底，高化臣以心臟病有隨時猝發可能為理由請求允許依法辦理退休，先是拍桌子說「退休並不犯法」，後來又和錢思亮長談四個小時，錢思亮不敢再加強留，終於同意他退休。⁴



錢思亮(右)以臺灣大學舊屬高化臣(左)為總幹事。

3 高化臣，〈高山仰止〉，《錢思亮先生紀念集》，頁86-89；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頁318。

4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下)〉，頁90-91。

錢思亮選擇總幹事人選，似乎仍以黨政關係良好為最重要考量，所以高化臣退休以後，仍然根據黨政關係極佳的原則，邀請前司法院副院長、以及他在臺大校長任內的法學院院長韓忠謨，以總統府國策顧問身分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韓忠謨與錢思亮是世交，兩個人的尊翁都在上海法界做事，他在錢思亮心中是清廉飽學的法律學者，可以利用他對法律知識的理解處理院方土地被侵佔的問題。⁵但韓忠謨在部屬眼中，卻是官僚氣十足，不像其前任勇於任事，遇事總是藉口院長未曾授權，不肯主動分勞，或是藉口法律窒礙，拒絕採取行動，結果原本案牘勞形的錢思亮更有體力不勝負荷的感覺。韓忠謨御下也缺乏政務官的擔當，遇事能推便推，若要下屬辦事，也不肯為其承擔責任，由於行事均以保護自己羽毛為最大考量，所以院裡其他同仁總感覺他領導的總辦事處在服務方面趕不上院裡硬體建設的快速發展。⁶



韓忠謨被奉為刑法泰斗，造就法律人才無數，翁岳生、陳水扁、朱高正、呂秀蓮、林山田等都受其提攜。錢思亮院長希望借重其法律長才，解決本院收購土地糾紛。

錢思亮所處的時代是政治動盪的時代，但也是臺灣經濟起飛以後的時代。當時蔣經國集中國力於十項建設，中央研究院的預算已經從2,000多萬元提升到1億元，增加約四倍。1989年，錢思亮更在院士會議的積極推動下，提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把全院預算從1億元逐步提升到7億元。配合預算的成長，錢思亮在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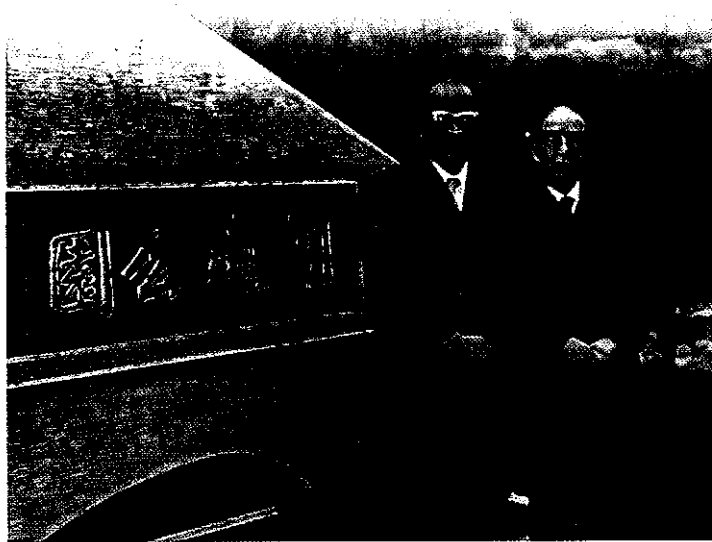
5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下)》，頁91-92。另見程明仁，〈「韓忠謨教授八五冥誕紀念會」紀實〉，《植根雜誌》，17：4(臺北，2001)，<http://www.rootlaw.com.tw/products/MtxtCont.asp?Mid=0900170040163> (2008/4/1查詢)

6 陶英惠，《雪泥鴻爪：近代史工作者的回憶》，頁55。

有的九個研究所之外，首先在李卓皓院士的幫忙下，匯合中央研究院和臺灣大學的力量，成立生物化學研究所籌備處，後來接管原來獨立的美國文化研究所，並相繼成立三民主義、地球科學和資訊科學三個研究所的籌備處。有了五年發展計畫，更開始了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分子生物學綜合研究室、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與統計學研究所的籌建。在這些工作上，尤其是第一個五年計畫工作中，高化臣總幹事都起了幕後積極推動的作用。⁷

與大學合作的生化所

從朱家驊代院長以來，中央研究院一直都有向生物化學進軍的想法。朱家驊更希望植物所向遺傳科學的方向邁進，胡適也從化學所所長魏品壽那裡得到一些類似建議。王世杰任院長以後，從美國敦聘生物組袁貽瑾院士回國擔任總幹事，但是兩人後來相處不睦。倒是生物組院士李卓皓非常反共，十分支持國民政府，成為生物化學研究所成立的最大動力。他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荷爾蒙研究所所長，早在1958年與胡適院長一同回臺時，就針對荷爾蒙研究作了24次公開演講，並建議成立一個符合國際水準的生物化學研究機構。王世杰院長對此事尤為積極，曾經屢



李卓皓(左)是第一位以人工合成人體生長荷爾蒙的生物化學家，有腦下垂體荷爾蒙之父的美譽，兩度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

⁷ 于宗先，〈感懷過去的成長、期待未來的發展〉，《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三十週年紀念：回顧與展望》，頁25。

次邀請李卓皓返國成立類似荷爾蒙研究所的生化研究所，⁸但是因為缺乏適當人才，始終只聞樓梯聲響。1970年年初，王世杰決定採取行動，事先沒有徵求李卓皓的意見，就從國科會爭取到200萬元的籌備經費，並請他認為當時臺灣最好的生物化學人才蘇仲卿開始籌備，準備在南港院區興建大樓。⁹沒想到事情還沒有進入工程階段，王世杰便被迫去職。錢思亮繼任以後，蕭規曹隨，成立以李卓皓為主任的諮詢委員會，並同意李卓皓的兩項主張，一是研究重點改為具有生理活性的蛋白質，尤其是探索臺灣研究已經有基礎的蛇毒蛋白質；一是把生化所研究大樓設立在臺灣大學，以便中央研究院和臺灣大學可以進行密切合作，由臺灣大學無償提供建地，同時在化學系成立生物化學研究所，招收碩士班學生。¹⁰凡是中央研究院的正副研究人員，均由臺大生化所合聘，一方面從事研究，一方面進行教學；臺大生化所的研究生，可以跟隨合聘教授學習，同時並可為中央研究院生化所提供所需研究人力。總之，一個單位，兩塊招牌，中央研究院的生化所和臺灣大學的生化所，組成一個團隊，集中全力研究蛇毒蛋白質。錢思亮為了順利推動籌備工作，另外提供300萬元經費，吳大猷主持的國科會異常慷慨，也提供1,600萬元作為建築設備和儀器圖書之用。¹¹

蘇仲卿是臺灣大學農化系出身的教授，顯然不容易在不同的化學系推動全新而陌生的研究計畫，尤其當時他已擔任動物所籌備處主任，奔走南港院區和臺灣大學之間，勢難兼顧設在臺灣大學校區的生化所所務。1972年錢思亮於是另請從柏克萊回來的李卓皓學生、臺大化學系教授羅銅壁擔任籌備處主任。在羅銅壁的奔走下，生化所在1973年又爭取到2,213萬元經費，不但聘用了4位研究員、1位副研究員、4位助理研究員和2位助理員，並借用臺灣大學的設備，終於實際做起蛇毒蛋白質研

8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7冊，頁455。

9 王世杰致趙元任、陳省身、李卓皓函，王世杰先生檔案，館藏號：302-01-03-11-523-003，1970/7/11；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8冊，頁348。

10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編，《中央研究院史初稿》，頁117。

11 設立新研究所案，錢思亮先生檔案。

究來。現在的翁啓惠院長當時剛從大學畢業，是生化所最基層的助理員，¹²他對酵素的研究就是在生化所啓蒙的。1974年年底，生化所的研究大樓興建完成，第二年原來寄生在臺大化學系的生化所便搬進去了。羅銅壁在李卓皓的協助之下，舉辦中美蛋白質蛇毒及荷爾蒙蛋白研討會，邀請國際知名大師前來傳授新知，他們的示範和鼓勵，對正在起步的蛋白質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1977年，生化所正式成所，羅銅壁遂順理成章出任第一任的中央研究院生化所所長兼臺大生化所所長。



羅銅壁(右)參與李卓皓合成人體生長荷爾蒙研究工作，為臺灣蛋白質化學的先驅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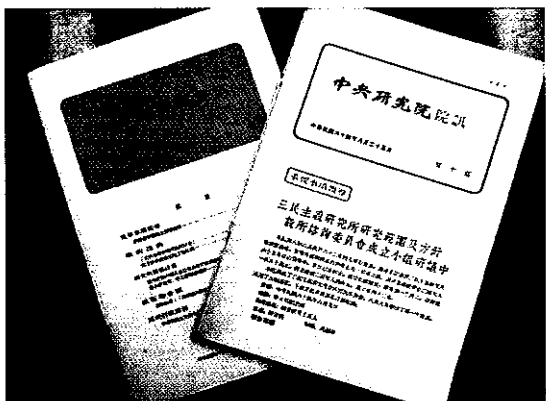
終於抗拒不了三民主義所的籌設

1970年代是多事之秋，先是政府退出聯合國，後是校園爆發釣魚台風潮，接著又是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國民黨中央非常擔心青年學生的思想問題，因此在各大學競相成立國父思想研究所。爲了配合這一個形勢，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委員吳俊才在1972年年底來函中央研究院指出，在中央研究院設立國父思想研究所其實是五年前舊議，當時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季陸提出此案，經蔣中正總裁批可以後，函請中央研究院據以辦理，現在已經過去五年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也從王世杰換成了錢思亮，但回覆若不是茲事體大，必須慎重，就是已準備編列預算，尙需時日，始終不見真正行動。吳俊才請求錢思亮根據總統的昭示，「排除萬難」，加以付諸實現。¹³到1973年，國民黨中央又決議加強「國父思想教育與匪情研究」，中央研究院分配到的任務是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於是錢思亮

¹² 設立新研究所案，錢思亮先生檔案。

¹³ 國民黨文工會主委吳俊才致信錢思亮關於國父思想所設立進度，錢思亮先生檔案，1972/12/1。

指示由于宗先、王聿均、王唯農、李亦園、屈萬里、高化臣和郭宗德等7人組成專案小組，以高化臣為召集人，研究如何落實這項任務。¹⁴專案小組的這些成員當然都是國民黨員，但學有專精，有獨立判斷，對國民黨中央加強思想教育的想法不必然全部贊成，只是勢逼處此，也就沒有表示不願意接受指派，公開抵制開會。錢思亮依據法令在院裡召開評議會討論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有人立即表示異議：一位評議員先承認三民主義是「建國根本」，接著卻指出中央研究院有組織法，組織法對中央研究院可以設置什麼研究所有明文規定，三民



三民主義所設所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刊載於《中央研究院院訊》。

所不在規定之中，所以政府不可以授意或命令中央研究院設立。不過，倘若政府非要設立不可，他建議設立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甚至政治大學或臺灣大學也可以。他的發言慷慨激昂，說得正十分暢快，另一位評議員李先聞卻忽然開口，冷冷說道，有話為什麼不向政府當局講，在評議會講，講了還不是等於白講。¹⁵李先聞為人耿直，言辭犀利，他在王世杰院長時代便以發言衝撞出名，但他對政治情勢顯然也十

分了解，這麼一說，那位發言的評議員也只好沉默不語了。錢思亮遂於1975年7月聘請臺大法學院院長韓忠謨擔任三民所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代籌備處主任。¹⁶

韓忠謨是耶魯大學出身的刑法學者，早年在司法行政部當過機要秘書，後來到臺灣大學教書，並擔任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長職務，非常照顧和提攜學生。他雖然過

14 中央研究院六十三年第一次院務會議記錄，信札，錢思亮先生檔案，1974/6/11。

15 葉曙，《閒話臺大四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頁32。

16 三民所的諮詢委員會在1975年8月9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由錢思亮院長親自主持，出席者有吳俊才、王唯農、姚淇清、陳超塵、孫震、韓忠謨、翁岳生、李亦園、陳奇祿、屈萬里和高化臣等15人。其會議記錄，見《中央研究院院訊》，10(1975/8/25)，頁1-5。

去與中央研究院一無淵源，但對中央研究院的學術生態也不是全然不知，所以擔任籌備處主任以後，也不願意大張旗鼓地四處找人，只任用了一位專任研究人員。他也因為志本不在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所以三個月後一有機會出任考試院銓敘部部長，便很高興地放棄託付離開三民所籌備處了。錢思亮隨即邀請陳昭南於1976年2月繼任籌備處主任。陳昭南是經濟學博士，甫從芝加哥大學歸來，是本省籍的後起之秀，在其經營之下，三民所的專任研究人員很快就增加到10人。後來有了所謂五年計畫以後，擴充更快，有趣的是，儘管陳昭南是國民黨黨員，登用研究人才時，卻始終強調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非要有博士學位不可，因此三民所有歷史學者、有經濟學者、有社會學者、有政治學者、也有法律學者，但是就是沒有幾位是當時所謂的三民主義和國父遺教專家。據說，韓忠謨1983年出任代總幹事以後，介紹了不少學生，其中良莠不齊，尤其有些人政治色彩過濃，陳昭南頗感窮於應付。重要的是，他禮聘進來的研究人員，表面上研究的課題都和三民主義有關，實際上卻仍在自己原有的專業領域中力求表現，他們可能抓住了三民主義揭櫫的基本理念，譬如民主和均富，卻拒絕把自己變成教條化三民主義和國父遺教的意識形態專家，更罕有一心甘願為國民黨思想控制服務的所謂御用學者。

1977年年初，美國出現政黨輪替，主張改善華盛頓和北京之間關係的民主黨總統卡特宣誓就職，國民黨在國家再次遭受嚴重外交挫折之際，格外強調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國民黨中央也要求中央研究院的黨員全力配合政策。錢思亮更不時



陳昭南研究清代銀錢比價，並將其提昇至理論層次討論；他奉行以社會科學豐富三民主義的國策，不讓意識型態專家侵占學術領域。

接到黨政機關推薦三民主義和國父遺教專家的書信，但他接到以後，總是請陳昭南自己判斷，決不干涉陳昭南的用人決定。¹⁷當時總幹事高化臣是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主任委員，為國民黨在中央研究院的最高負責人，照理可以直接要求陳昭南配合黨部政策；但因為錢思亮的態度如此明顯，所以他也不敢公然違抗錢思亮的意思，強自進行政治干預，陳昭南因而可以有放手做事的空間。1977年，國民黨中央決定「促進三民主義研究的學術化，並使三民主義思想融化於各種社會科學研究之中，進而能與國際學術研究之發展相聯繫」。這個黨部指示並不能改變陳昭南新聘研究人員時重視學校資歷卻不重視黨內資歷的政策，反而為他在新聘研究人員時爭取到更大的揮灑空間。陳昭南可以利用民生主義、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寬廣的範疇，要研究人員繼續從事其專長的研究，譬如民生主義研究社會的財富分配、勞動利用、土地分配和銀行國際化，民權主義研究人權改善和行政效率；但當陳昭南建議的研究議題中出現「我國公教人員對國家認同之研究」這個名目時，高化臣就堅決不同意了，不過他也只是建議刪除，並沒有追究到底是誰的提議。當時，三民所建議影印或縮影國父紀念館有關三民主義的資料，有人發現這些資料本來是不適合公開流傳的，建議從嚴進行審核。陳昭南建議審查的範圍越小越好，有問題的書籍則可像近史所一樣，設置特藏室管理，定期由警備總司令部派專人檢查，但可供研究學者使用。¹⁸1981年8月三民主義研究所正式成立，差不多十年之後，時移勢變，李登輝總統推動民主化政策，各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乘機紛紛改名，中央研究院的三民主義研究所，既然強調吸收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的研究成果，也趕上了這一波改名潮流，於1990年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一方面突顯社會科學家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則在所名中保留孫中山的名字，藉以表示對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敬意。

17 麥朝成，〈我對社科所的感念與期許〉，收入李常井主編，《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周年特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1），頁4。

18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檔案，檔號：0066-0153/01-02-01。



錢思亮(左)手拿鏟子，為本院在臺大的物理所地震組舉行破土典禮。地震組主任蔡義本(右前一)釐清臺灣板塊輪廓，奠定臺灣地震研究基礎，後並籌備成立本院地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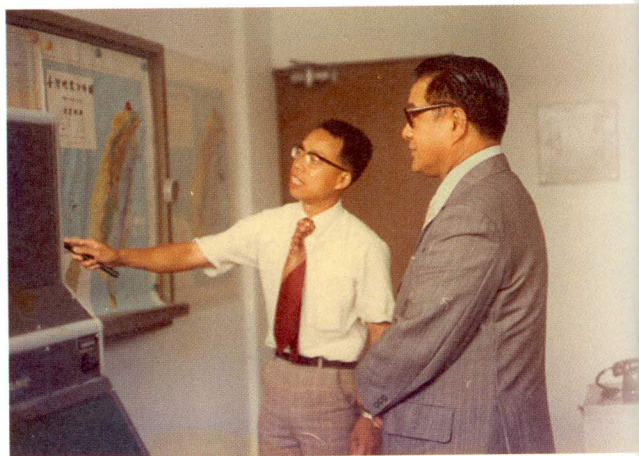
擴大研究領域：地球所、資訊所和統計所

錢思亮在旅美院士的大力推動和協助之下，接著又成立了一些新所。第一個成立的是地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背後的推手是吳大猷院士和鄧大量教授。吳大猷對中央研究院大陸時期的地質所、氣象所和物理所情況都有一些了解，而他對這幾個領域本來也都有相當涉獵。1969年吳大猷主持科導會期間，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地震專家鄧大量教授不遠千里，前往他居住的美國紐約州水牛城拜訪，強調臺灣位於西太平洋的地震帶上，每年都有或強或弱的地震幾百到數千次，如果地震記錄和資料蒐集完整，不僅有助於學術探討，也可以對臺灣的重大交通、工業、水利建設作出非凡貢獻。當時臺灣的建築正向高空伸展，需要各種防震數據，地震的研究實在迫切，刻不容緩。吳大猷聆聽之後，當場就委請鄧大量教授擬定一個地震研究十年計畫，規劃所需要人員和儀器，並整合臺灣已有地震測量站，重新建立全島自動測震系統。錢思亮繼任院長以後，這個研究計畫便由物理所接管，在物理所內設置地震研究小組，由蔡義本擔任組主任，為當時的重大工程，譬如曾文水庫、青山水力電廠和金山核能電廠，提供施工所必備的地震資料和分析報告。這時候小組的經費全部由國科會核撥，但為了穩定研究工作，吳大猷在1974年強力推動其在中央研究



事緩則圓

院單獨建所的工作，由蔡義本教授追循生化所模式，成立地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與臺灣大學合作興建研究大樓，同時與臺灣大學地質系和地理系合作訓練學生。1977年夏，地球科學大樓在臺灣大學落成，蔡義本率研究人員相繼遷入，並繼續以五年時間籌備，到1982年地球所終於正式成所，蔡義本成為第一任所長，全所以研究地震工程、地球物理、地球化學為研究重點。¹⁹



蔡義本(左)在臺大本院物理所地震組紀錄室裡為來訪的教育部長蔣彥士(右)簡報。

資訊所的成立，背後則有兩大推手，一位是周元燊院士，一位是竇祖烈院士。周元燊是現任數學所所長，同時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統計學教授；竇祖烈則是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電機工程教授。1970年代初期是計算機研究開始出現大突破的時代，周元燊院士對科學的發展動向相當敏感，已經看到計算機的潛能，認為它將對科學研究帶來革命性的衝擊，所以在數學所內設有計算機組，同時在他的建議下，錢思亮得到張系國和劉兆寧兩位旅美學者的協助，成立中文電子化研究小組，開始研究中文電子計算機和中文訊息處理。竇祖烈也是電子計算機的先驅型人物。1974年，竇祖烈回國參加院士會議，錢思亮乘機召開第一屆國際計算科學會議，並舉辦計算科學研討會，在臺灣掀起研究計算機的熱潮。打鐵趁熱，次年，周元燊不

19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編，《中央研究院史初稿》，頁125；吳大猷，〈我與中央研究院〉，《我的一生：學·研·教·建言》，頁138-139；吳大猷，〈中央研究院成立「自然環境科學研究所」之建議〉，《人文·社會·科技》(吳大猷文選第2冊)(臺北：遠流，1990，初版三刷)，頁23-29。地球科學研究所原來擬議的名稱為自然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的對象包括颱風，背後的推手是旅美院士張捷遷教授。1971年國科會曾在物理所成立大氣物理組，提供經費和員額，與其他研究氣象的機構合作，展開研究。1974年吳大猷所擬的設所計畫，就是想以大氣物理組為基礎，在獨立的自然環境科學研究所繼續發展。後來張捷遷教授的政治認同轉向，因此地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及其正式成所後似乎都沒有大氣物理研究這個項目。

僅試圖說服錢思亮單獨以數學所的計算機組為基礎，另外成立訊息科學研究中心，並且試圖說服當時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擔任教職的張系國長期回臺工作。在1976年夏天的院士會議中，周元燊更會同竇祖烈，以及其他幾位院士建議籌設電子計算機科學研究所。但是推動籌備工作，需要實際工作的人才，而一直到1977年秋才有學者願意回國擔任專職研究人員，竇祖烈於是成立資訊所籌備處，並組成九人諮詢委員會，正式開始工作。1978年，竇祖烈認為時機成熟，便要郭德盛以籌備處研究員兼任代主任，開始興建研究大樓，並於1980年啓用。可惜錢思亮沒來得及看到資訊所正式成所，便積勞去世。繼任的吳大猷院長雖然認為資訊研究的發展為中央研究院當務之急，籌備不到四年就正式成所，但是在新聘人才方面始終無法取得突破，年輕的學者寧願轉到國立大學或是企業界工作，或留在美國享受優越的研究環境；資深而有號召力的合格所長人選，特別難覓。有一段時間，吳大猷還親自兼任資訊所



竇祖烈(右)為國際著名機率與第一代電算機學者，為創建資訊所投入不少精力。(左為吳大猷)

所長，後來請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李家同勉強前來兼代所務，可是資訊所人才流失的趨勢還是難以阻擋。

統計所的幕後推手也是周元燊院士。他主持數學研究所時，就曾經成立過統計組。他認為統計是推理方面的一門科學，與純粹數學的差別是，後者推理靠確定的因果關係，前者推理則靠不確定的因果關係，其主要內容為機率和統計，既是理論性的科學，也是講究應用的學問。當時中央研究院有很多所都用到統計學的知識，像數學、資訊、動物、植物、經濟、三民各所皆然。他認為成立一個新所後，可以就各種數量化的資料做有系統的分析 and 客觀的研究，也可以對臺灣工農商業所面對的實際問題提出建言。1980年，錢思亮採納其意見，成立以周元燊所長為召集人的諮詢委員會，並聘請經常回臺灣幫忙的旅美學耆趙民德教授為籌備處主任。趙民德兩年之後才能拋棄在美國的工作長期回臺，並展開數理、生物、人文和工業統計的理論和運用研究。²⁰1987年統計所正式成立，他成為第一任所長，但是統計所的發展似乎不如理想。評議員李國鼎不久前來調查實況，他發現只有生物統計略具規模，其他無論是數理統計、工業統計還是人文統計，都談不上研究，既看不出長期發展方向，也沒有大型的計畫，同仁之間不太來往，跨所關係也異常淡泊，統計所完全不能針對其他學科的需要做一些比較有規模的研究。²¹

逆境中忍辱負重

1970年代是臺灣政治發展的關鍵年代。當時美國在視中共為敵國二十年後，由於越戰失利，終於放棄和中共不相往來的圍堵政策；中共也因為蘇聯的軍事威脅變得異常嚴重，力圖引美制蘇，雙方開始改善關係；美國總統尼克森遂在1972年年初訪問北京，並在上海簽訂公報，臺灣的外交形勢開始出現嚴重逆轉。其次，在此

20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編，《中央研究院史初稿》，頁130-137。

21 趙民德，〈統計學研究所籌備工作報告〉，李國鼎先生檔案，C4-8.5，上有李國鼎筆記。

關鍵時刻，臺灣經濟正面臨向上提升的瓶頸，教育方面也面臨兩個挑戰，一個是臺灣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進入40幾歲的學術和事業巔峰期，渴望打破學術界的現有秩序，而且深受美國文化教育的影響，對威權體制下的政治有深刻的不滿，他們有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負，紛紛響應政治強人蔣經國革新保臺的號召。另一個則是臺灣的留學生已經有數千人在美國完成學業，一帆風順、事業有成的學者固然不少，但年輕一輩的美國就業市場卻有不斷惡化之勢，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想回國尋找機會。就在這個時候，海外留學生和國內校園都爆發了保衛釣魚台運動，有的知識分子左轉，開始認同中共的社會主義或國族主義理念；有的知識分子右轉，開始認同臺灣獨立建國的主張。

面對變局，蔣經國感到加強控制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的需要。中央研究院也出現全新的問題，亦即如何處理研究人員和院士各種左右傾言行，進用新人時，更要面對如何處理言行有親中共或臺獨傾向或嫌疑的年輕學者，既不上限上綱，亂戴帽子，也不爲淵驅魚，助長已經難以挽救的既倒親共狂瀾，尤其不要平白殃及剛剛開始發展事業的無辜青年學子。

首先是海外院士的問題。1971年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何炳棣在離開中國大陸二十多年後，首次回到中國大陸訪問，他在結束訪問以後不僅以「中國的新面貌」爲題在芝加哥大學校園演講，公開讚美中共政權的成就，同時也在美國報紙上發表訪問感想，並促請美國政府承認中共政權。王世杰對此義憤填膺，要求錢思亮院長嚴重處理。但錢思亮認爲院士爲終身名譽職，不具備公職人員之身份，堅持只能施以道德勸說，因而拒絕以中央研究院院長名義作公開譴責。其實制裁何炳棣的問題在王世杰院長任內早就發生了。當時何炳棣應邀訪問新加坡，並在當地發表兩場重要學術演講，第一場討論明清的社會流動，在作結論時何炳棣批評到國民政府中央用人政策的自我封閉性；第二場討論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的關係，認爲儒家有教無類的主張和人本主義的理論仍然影響到毛澤東思想。這兩場演講都是學術演講，就事論事，不料傳到國民黨耳朵，變成惡意「攻擊政府」和「強調毛匪思想

[illegible][illegible]

1972年3月5日美國紐約每日新聞報，刊載物理學家楊振寧對於中國的看法，海外華人學界捲起左轉浪潮。

訪問團抵達中國大陸以後，獲悉聯合國通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席次的消息，立即主動邀約同行留美學者，共同致電周恩來表達感謝之忱；回到美國以後，他又發表公開揄揚中共社會主義建設有成的演講。到1972年，何炳棣的政治改變不再是一個教授的事情了，楊振寧等院士也有類似言論，甚至促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²³只是，面對國內「漢賊不兩立」的反共輿論，錢思亮堅持應以中央研究院的組織法為重，對政治上轉向中共的院士，可以私下道德勸說，卻萬萬不可公開惡言相向，²⁴尤其不可不分青紅皂白，只要曾經前往中國，便加以口誅筆伐。

1973年4月，錢思亮趕到美召開院士座談會的機會，討論旅美院士訪問中國大陸的現象，他說私下晤談了4位到過中國大陸的院士，發現他們到中國大陸訪問的動機不同；有一邊倒向中共政權的，但更多的院士只是為了探親，或者是因為思鄉心切，或者是因為滿足好奇，並無其他政治動機。他也代表政府表示，仍然歡迎所有院士回到臺灣活動。只是前往中國大陸的院士有增無減，甚至有人成為美國學術團體與中國大陸對等團體交流的橋樑。²⁵1974年全美華人協會在美國紐約時報等主要報紙刊登全幅廣告，呼籲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列名者300餘人，其中居然又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何炳棣、任之恭、楊振寧、張捷遷、牛滿江、陳省身和趙元任等7人的名字。當時無論國內外，都有予以制裁的強烈呼聲，有要求司法機關調查者、有要求開除院士名譽職者，有動員其他院士和評議員譴責者，但是錢思亮認為所謂制裁，徒託空言，而所謂譴責「只是情緒之發洩」，徒然增加海外學人之反感，僅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吸引力而已。錢思亮力主表面不作處理，

23 劉定一致蔣彥士函，錢思亮先生檔案，(1972/8/26，據之，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張明覺、王浩、易家訓、葉楷、王憲鍾、張捷遷、劉子健、沈元壤(1990年當選院士)、李祖安於1972年6月到中國大陸訪問。其中，任、林、易、王(憲鍾)、張四人為院士。

24 何案複製文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檔案，檔號：006-01173/01-01-01。

25 美國分區院士會議，錢思亮先生檔案。張光直在這一年到中國大陸，1978年10月余英時也在張光直院士的安排下以「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名義前往中國大陸訪問。見余英時，〈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悼亡友張光直〉，《聯合報》，2002/2/4，37版。

暗中則仍加強聯繫和疏導。²⁶然而，此後前往中國大陸的海外院士還是越來越多，除前述諸人以外，更有李政道、丁肇中等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吳健雄、袁家驊、王浩、顧毓琇等重量級學者。

1977年，美國報紙再次出現全美華人協會寫給美國總統卡特的公開信，呼籲卡特立即承認中共政權，其中何炳棣等7位院士再度列名連署，國內報紙聞訊紛紛發表社論，要求褫除彼等院士資格。立法院更有強烈意見，有委員建議修改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以便開除「附匪院士」，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也表示強烈關懷，錢思亮不得不有以回應。但是他基本上還是重申其原有主張，認為既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依法為終身名譽職，中央研究院就無權加以開除，只能給予道德勸說，²⁷不過同意回到院裡以後會再請評議會專案討論。1978年春，錢思亮到立法院備詢，這一次立法委員的質詢口氣就沒有前幾次那般客氣了。立法委員莫萱元再次追問，為何不開除有「附匪」言論的院士？學問上雖然是巨人，但忠貞有問題，為何不加以追究？立法委員吳延環不知道美國學術界這時候也紛紛派人前往中國大陸瞭解情況，知名學者李遠哲就參加了一個參觀訪問團，他只是一再要求公布訪問中國大陸的院士名單，錢思亮則是重複老話，加強與海外院士的聯繫，再有到中國大陸訪問的確實證據，一定依法辦理，呼籲立法委員別輕信外界傳言。錢思亮還告訴立法委員說，87位院士中有57位旅美，約三分之一擁有美國國籍，三分之一已取得永久居留權，只有三分之一拿中華民國護照。²⁸

錢思亮再三重複自己的主張之餘，也一直在為自己的主張尋找心理奧援。早在前一年年底，他就要求評議會討論如何處理何炳棣等人的院士身分問題，評議會在這一年年初也成立了包括吳大猷、徐賢修、閻振興、魏火曜、陳雪屏、蔣彥士、葉

26 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分組座談會綜合報告，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檔案，檔號：0066-0191/01-01-07。

27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檔案，檔號：0066-0129/01-01-03；0066-01173/01-01-01；上年九月立法委員詢案處理經過及有關資料，捌、立法院質詢，錢思亮先生檔案。

28 67年度質詢預算，捌、立法院質詢，錢思亮先生檔案。

公超、李濟、屈萬里、阮維周、高化臣等11人的專案小組。他們的發言基本上支持錢思亮的立場，但是中央研究院終究抗拒不了外界的批評和壓力，這一年2月錢思亮首先因為臺灣大學數學系教授項黼宸院士由臺灣潛往中國大陸而將其除名。²⁹接著同年4月的評議會便通過決議，凡連續六年不參加院士會議或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者，中止其院士職權，但有健康理由或與院方有任何聯繫者不在此限。³⁰幾個月後夏天到來，顧毓琇院士來臺參加院士會議，立法院針對其發表的親中國大陸言論進行質詢，錢思亮援引項黼宸案的前例，專案報請總統府請示處理意見。總統府沒有回應，但是到了1979年，錢思亮便根據評議會決議，中止何炳棣、張捷遷等人的院士職權了。然而，他對顧毓琇的院士身分卻未處理，直到他再次前往中國大陸活動，才終於根據總統府處理顧毓琇院士國大代表身分的作法，將其院士職權停止。

錢思亮對院士到中國大陸留有餘地的作法，其實是冒了很大的險，因為批評他姑息旅美院士的言論不僅出現在一般報紙之上，也出現在國民黨的官方報紙《中央日報》之上。錢思亮不瞭解幕後真相，以為《中央日報》的報導暗中有蔣經國授意，曾經三度提出辭呈，然而蔣經國透過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也三度請其打消辭意，甚至在《中央日報》社長楚崧秋堅持刊登有關消息以後，下令將楚崧秋免職，間接表示其對錢思亮的支持。³¹由於錢思亮堅持反對將院士公開除名的政策，他日後不僅爭取到一些曾赴中國大陸參觀但感覺失望的院士回歸，同時也使得接任下屆院長的吳大猷，得以利用院士對中共政權的重新評估，鼓勵他們回臺灣積極參與院士活動。³²錢思亮院長任內後期，1982年回國參加院士會議的費景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出席院士會議時親自草擬了一個討論大綱，要求討論如何促進國家學術

29 總統府臺統一智字第零五六五號函，李國鼎先生檔案，1978/2/28。

30 捌、立法院質詢，錢思亮先生檔案，1982/4/3；錢思亮致吳大猷等十一位先生信稿，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檔案，1978/1/9。

31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憶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下)》，頁78-79；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寶島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116。

32 夏語冰，《接待江澤民的顧毓琇，一度被臺灣拒絕往來》，《新新聞》，556（臺北，1997/11），頁77-79。



強化中研院應自清除叛國院士始

中央研究院，為終身榮譽職，但對於少數已有違反國家基本立場，甚至藉此以圖私利，研究最高機關，應予嚴正處理，以維護其名譽。在一般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目中，中央研究院，為終身榮譽職，更應如此。不幸的是，近年來，由於少數叛國院士，為中共偽政權奔走，俾使中華民族，實久已構成叛國之罪行。這少數人的名字，大家耳熟能詳，毋待列舉。我們認為，中研院對這一問題，不宜再因循，而應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與決心，儘速作一斷然處理，以恢復中研院學術研究崇高，機關在國人心中之清譽。而中研院第十二屆院士會議閉幕之時，本報社論曾就院士選舉及研究工作之推動提出建議，其中一點指出：院士為國家所授

予的崇高名譽，為終身榮譽職，但對於少數已有違反國家基本立場，甚至藉此以圖私利，研究最高機關，應予嚴正處理，以維護其名譽。在一般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目中，中央研究院，為終身榮譽職，更應如此。不幸的是，近年來，由於少數叛國院士，為中共偽政權奔走，俾使中華民族，實久已構成叛國之罪行。這少數人的名字，大家耳熟能詳，毋待列舉。我們認為，中研院對這一問題，不宜再因循，而應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與決心，儘速作一斷然處理，以恢復中研院學術研究崇高，機關在國人心中之清譽。而中研院第十二屆院士會議閉幕之時，本報社論曾就院士選舉及研究工作之推動提出建議，其中一點指出：院士為國家所授

予的崇高名譽，為終身榮譽職，但對於少數已有違反國家基本立場，甚至藉此以圖私利，研究最高機關，應予嚴正處理，以維護其名譽。在一般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目中，中央研究院，為終身榮譽職，更應如此。不幸的是，近年來，由於少數叛國院士，為中共偽政權奔走，俾使中華民族，實久已構成叛國之罪行。這少數人的名字，大家耳熟能詳，毋待列舉。我們認為，中研院對這一問題，不宜再因循，而應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與決心，儘速作一斷然處理，以恢復中研院學術研究崇高，機關在國人心中之清譽。而中研院第十二屆院士會議閉幕之時，本報社論曾就院士選舉及研究工作之推動提出建議，其中一點指出：院士為國家所授

1977年5月2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取消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院士的院士頭銜。

研究工作。³³他自己隨後也積極投入三民所的研究工作，親自參與經濟發展以後財富分配的研究。同樣的例子到吳大猷院長時代更多，被列入拒絕往來的院士中，不僅楊振寧和李政道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相繼回國，何炳棣、張捷遷、陳省身和顧毓琇等院士也都相繼返國參加院士會議。林家翹院士還積極建議成立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並協助該所的初期籌劃工作。

「一國兩治」模式的學術外交

1970年以前，臺灣在美國的支持下，基本上並無參加國際科學活動的困難。臺灣的困難與其說是外來的，不如說是內生的，因為臺灣沒有最基本的科學社群，尤其缺乏享譽國際的科學家。從1970年以後，臺灣的科學發展越來越快，也有越來越多的科學人才，然而在參加國際科學組織活動時卻開始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認為中國大陸人口

33 民國71年第十五次院士會議，院士會議，錢思亮先生檔案。

比臺灣多十幾倍，地區也比臺灣大三十幾倍，相信其科學成就也有值得注意之處，所以主張邀請中國大陸以中國名義加入活動。這些科學組織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國際科學聯合總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ICSU，科總會），³⁴除了有國家會員（National Members）以外，還有科學各學門的國際聯合會，譬如國際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和國際太陽地球物理科學委員會，至1982年為止，一共有十八個。科總會的決定雖然對各科學聯合會沒有拘束力，但是影響極大，如果驅逐臺灣出會，則其他學門的科學聯合會一定會迅速效尤。

中央研究院是1937年以中國的一個學術組織名義加入科總會的。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首先就有國際純粹及應用物理學聯合會提出邀請中共加入的主張，接著科總會內部也出現了同樣的聲音。1972年蘇聯、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就像在聯合國一樣，要求邀請中共代表中國參加，如果當時此案交付大會討論表決，臺灣的會籍能否保全實在難有把握。出席科總會大會的中央研究院代表，在了解到這一點以後，要求大會不要就邀請中共一案進行討論，只是表決要不要把全案移送理事會全權處理就可以了。由於美國暗中支持，理事會拒絕接受中共進入科總會的先決條件，亦即臺灣必須立即退出，中共不肯妥協，臺灣於是得以維持科總會的會籍。1974年年初，科總會的法籍前任會長到北京訪問，美籍現任會長到臺北訪問。³⁵錢思亮取得政府的同意以後，表示中央研究院僅代表中華民國實際控制地區的科學團體。³⁶科總會現任會長有了這個理解以後，立即強調科總會並不是政治性的組織，會員也不是以國家為會員，可以由一個地區的科學團體代表參加，中央研究院僅代表中華民國控制下的臺澎金馬地區參加而已，故可以繼續享有其代表權。中共無法

34 該組織後於1998年更名為「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s），然其外文簡稱仍維持為「ICSU」不變。

35 吳大猷，〈我國在ICSU的會籍問題〉，《人文·社會·科技》，頁161，說1974年的會長是J. Coulomb，副會長是H. Brown；唯據ICSU網站資料，H. Brown於1974年取代J. Coulomb為會長。參見：http://www.icsu.org/5_abouticsu/STRUCT_ExeBoa_officers.html（2008/3/5查詢）

36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9冊，頁274，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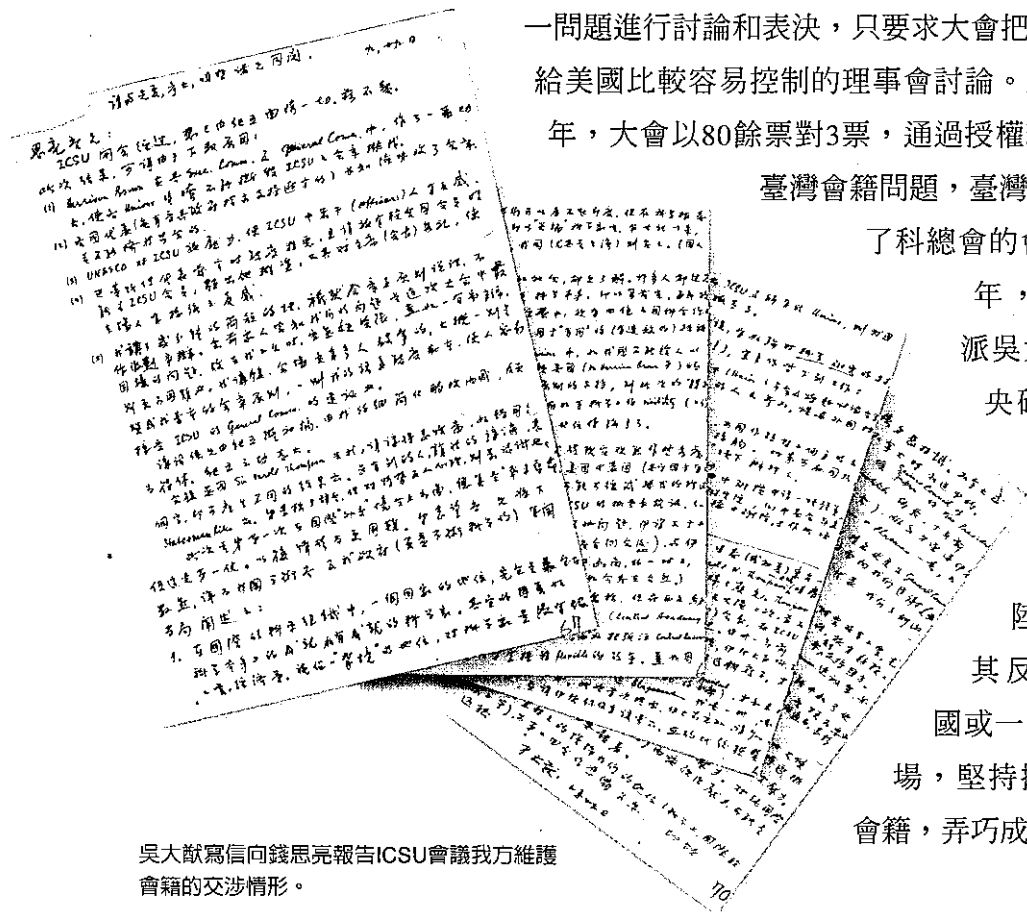
接受這一個說辭，於是拒絕科總會的邀請，未派遣代表與會，臺灣的會員資格也因此得以鞏固。

1975年，科總會大會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舉行，錢思亮派甫辭卸國科會主任委員的吳大猷，率其老部屬郝履成、王紀五兩人前往參加。當時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藉口對科總會有財務補助，要求科總會以中共取代臺灣，吳大猷抵達伊斯坦堡以後，要求與會的中央研究院代表以低姿態發言，不得涉及政治、不得攻擊中共，只強調臺灣遵守會章，要求保留會籍，並暗中動員同情我方的其他國家代為發言，

把工作重點放在反對大會就哪一個政府代表中國這一問題進行討論和表決，只要求大會把會籍問題交給美國比較容易控制的理事會討論。結果，這一年，大會以80餘票對3票，通過授權理事會解決臺灣會籍問題，臺灣因此也保留

了科總會的會籍。1977年，錢思亮又派吳大猷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科總會大會。由於中國大陸事前強調其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立場，堅持排除臺灣的會籍，弄巧成拙，大會反

吳大猷寫信向錢思亮報告ICSU會議我方維護會籍的交涉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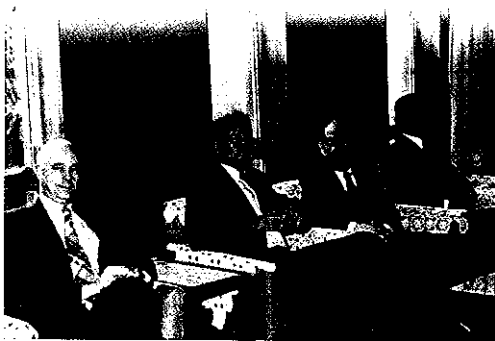


而通過一個議案，重申科總會的「科學普遍性」，「不以政治排拒會員」。中共堅持其政治立場，再次拒絕接受科總會的邀請，未派代表與會，臺灣也因此得以再次保存其會籍。

然而，事情的長期發展，對臺灣異常不利。1976年和1977年，中共在堅持排我的前提下，進入了兩個科學聯合會。錢思亮開始想到，如果中共不再堅持以驅逐臺灣為入會前提，也派代表參加，屆時臺灣就要面臨是否立即退席的選擇了，臺灣是否力爭同時也代表中國參加科總會呢？1978年，錢思亮得到的總統府訓令是，漢賊不兩立。幸好，當時中共並不知道臺灣最高當局的決策，否則，中共進入科總會以後，臺灣將不得不自動退出。其實，中共當局當時的策略是，由中國科學院以中央研究院的拉丁文名「Academia Sinica」入會，至於中央研究院，則可以同時成為會員，不過必須放棄拉丁文原名，另用「Academy of Science, Taiwan」這一個新名字。對這個提議，我方堅決反對，表示決不改變自己原有的拉丁文名字「Academia Sinica」，僅可同意在拉丁文名字後面加註臺北地名。科總會在瞭解我方的立場以後，並未同意中共的官方要求，而這一年在雅典舉辦的科總會大會中也沒有國家出面挑戰這一個決定。³⁷中共以要求未遂，再次拒絕接受科總會的邀請。

1979年，錢思亮接受吳大猷的建議，邀請科總會會長、秘書長和執行秘書一同前來臺灣訪問。這時候，錢思亮終於說服了最高當局，參加國際科學組織和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不一樣，並沒有國歌和國旗問題，即便改名為「位於臺北的某某科學組織」，也無不可。科總會得知蔣經國的底線後，翌年，吳大猷再次率領郝履成、王紀五、動物所所長蘇仲卿，以及地球所所長蔡義本到荷蘭參加其大會時，便邀請中國大陸以北京中國科技協會名義參加。中共本來已經同意這一個安排，事到臨頭，忽然反悔，所以科總會沒有出現中國大陸和臺灣同時擁有會籍的事實。

37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檔案，檔號：0072-0132/01-01-01，頁11-12。



1980年3月17日邀請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IUPAC)會長及秘書長來訪。



1980年3月21日邀請國際藥理學聯合會(IUPHAR)會長來訪。



1982年11月12日邀請國際地理學聯合會(IGU)會長及秘書來訪。

錢思亮為臺灣科學界爭取到了國際活動空間，而吳大猷則是在外交最前線負責折衝的主要領導。1982年科總會在倫敦開會時，吳大猷和他北大物理系的老朋友、中共首席代表周培源終於達成了一個解決方案：科總會承認臺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但為了保持臺灣會籍和投票權，附帶一解釋文強調，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並不具有政治聲明的性質，只是說明科總會同時有代表臺灣和中國大陸兩個地區的會員而已。吳大猷顯然認為只要臺灣承認「一個中國」的先決條件，海峽兩岸的科學家就可以各自表述，平等來往。臺灣科學家保持了國際的活動空間，也可以藉由國際交流，改善國內的科學水準。³⁸就在臺灣和中國大陸並為中國一部分的前提下，中共同意加入科總會，從此以後，科總會也有了兩個彼此獨立但地位平等的中國會員，並同時要求所屬各科學聯合會循此原則，不得再要求排除臺灣會籍。

但是吳大猷的樂觀，六年後受到挑戰，並差一點破局。這一年科總會年會原定於日本召開，但是因為日本抵制南非科學家與會，違背了科總會「科學家普遍參

38 吳大猷，〈我國在ICSU的會籍問題〉，頁157-174。

與」的原則，所以改在北京召開。這時吳大猷已經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而總統大位由李登輝繼任，吳大猷認為是否前往北京與會，事涉外交部的職權，要求外交部表示意見，沒想到外交部的回應是不符合國策，不准前往。吳大猷於是面請李登輝總統干預，卻未獲首肯。後來還是因為李遠哲、楊振寧和李政道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公開要求派代表前往北京參加科總會年會，李登輝才改變心意，而臺灣也因此避免了被中共藉機驅逐出科總會的命運。

外界對中央研究院的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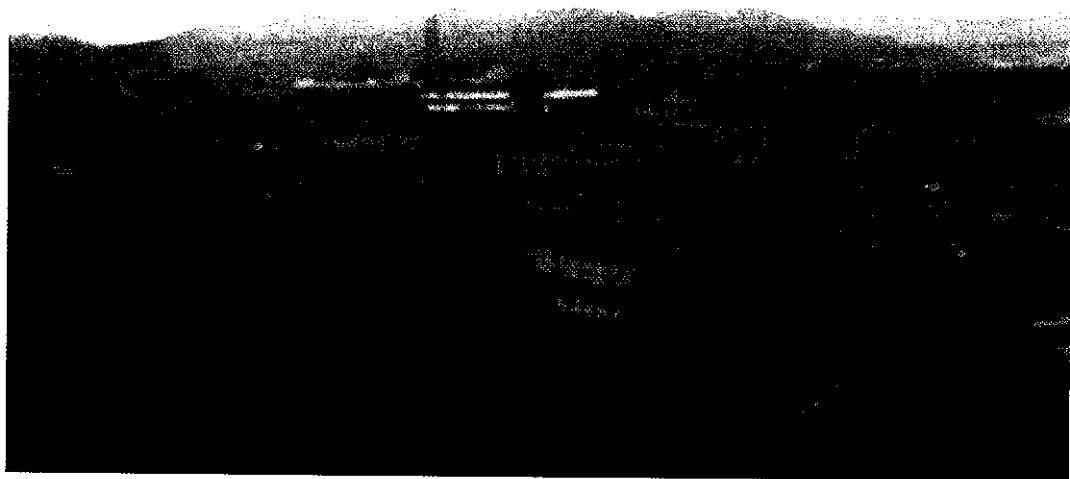
胡適擔任院長的時代，有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和立法院委員，因為他年少輕狂時曾經提過全盤西化的主張，對其不斷進行抨擊，尤其抨擊他對傳統文化的研究不重視。當時他主持的長科會提供學者獎助，因為主其事的是中央研究院的領導人物，而得到獎助者又很多是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因此也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批評，說是黑廂作業，學術分贓。到王世杰院長時代，又有人懷疑美國研究中國學者的政治傾向，尤其是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指責他是中共的同路人，進而質疑任何與他有關的學術交流，甚至批評中央研究院的近史所出賣國家重要文物。總體說來，抨擊的聲音，氣甚壯而理不直，雖然胡適院長引以為累，王世杰院長甚至為之請辭，卻都毋須反躬自省，引以為戒。

錢思亮院長時代，外交全面逆轉，中央研究院受到的批評也比以前嚴重。當時最重要的批評，是學術一潭死水，拿不出令外界心服口服的成績，許多研究都與國家社會毫無關連。更具體的批評是，十三個研究所當中，竟然有七個所的所長不在國內，都是代所長在做事。譬如數學所所長周元桑甫於1970年9月到任，一年之後便遠赴美國擔任哥倫比亞數理統計系教授，而且拒不辭職，反而越過同所資深研究人員，任命剛到職不久的劉豐哲為代所長，進行遙控。³⁹又譬如近史所所

39 數學所□□□致錢思亮函，錢思亮先生檔案，1971/12/22。



長郭廷以於1969年9月赴美講學，⁴⁰全所有5位研究員，卻請資淺的副研究員王樹槐代理所務，次年9月更請辭所長職務，拒絕賦歸。近史所內部還有所謂「三公」的資深研究員和中生代研究人員的嚴重矛盾，兩派各執一辭，錢思亮爲了平息雙方爭執，於1971年7月禮聘年齡已經超過80歲的梁敬錚從美國返國，中生代研究人員沒有想到，他履任之後居然立刻以研究員王聿均爲副所長，對他的舊式官僚習氣尤其不滿，而他無緣無故給一位同仁丙等考績，更激起全所年輕研究人員的公憤，以致對其進行嚴厲批評。梁敬錚因此不斷求去，錢思亮則不斷慰留，到1972年8月梁敬錚不告而別，逼得錢思亮不得不請資深研究員王聿均代理所務，直到1973年克服了近史所內部的派系爭執，才敢真除王聿均。⁴¹這些事情，外界未必清楚真相，但看到代理所長人數太多，於是提出批評，可是錢思亮也拿不出特別好的辦法。



錢思亮院長時期的院區景觀。

40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下)》，頁73。

41 錢思亮先生檔案：近史所梁敬錚致錢思亮函，1972/10/3；□□□、□□□、□□□致錢思亮，1973/1/9；錢思亮致梁敬錚函，1973/1/9；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下)》，頁75。

1977年年初的情況最壞。是年，數學所所長周元桑回美任職，所務交由副研究員謝聰智代行。同年，動物所所長蘇仲卿赴美進修，所務也交由副所長張崑雄代行。這一年，物理所所長王唯農辭職，由副所長林爾康代理，但林爾康同時兼任長科會的自然科學組組長，實在難於分身。同樣離譜的是，美文所所長陳奇祿前一年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卻仍然兼任美文所所長、臺大文學院院長和民族所研究員等幾個職務，指定副所長朱炎代理所長。⁴²當時更引人非議的是，專職研究人員不做研究，反而千方百計進入官場，一個人兼幾個職務。除了熱中官場和兼職以外，有的所還鬧派系和人事鬥爭，近史所的人事紛爭最激烈，剛出頭的青壯派指責老一輩無理打壓，不讓升等，老一輩認為青壯派結黨營私，不懂倫理。化學所處於世代交替之中，前後任所長無法交接，弄得研究人員不得安寧。

另外一個備受攻擊的對象是院士制度。有的是制度方面，有的是人選方面，兩方面有時交叉，有時不相關連。制度方面最受攻擊的是院士資格的認定。院士資格的認定有兩條，一條是學術表現，另一條是學術服務。學術表現需要同行認定，但院士提名時，常有跨學門的情形，人文組院士推薦生物組和數理組候選人，因而引發非議。這種情形尤其以院士制度剛恢復時期比較普遍。胡適就曾副署推薦過生物組的李卓皓和王世濬。⁴³李卓皓和王世濬都是一流的生物學者，但當時院士總共只有19名，平均一組只有6人，要找5個人連署實在不容易，所以不得不有此權宜之舉。隨著院士人數的增加，這種情形自然減少。外界的批評，僅加速這種跨組推薦情形的消失。至於主持最高學術機關五年以上成績卓著的條件，就比較容易導致猜疑了。胡適認為近代史學者蔣廷黻從政二十年以後雖未出版過任何學術著作，但是當年主持清華大學歷史系時有計畫地培養了一些歷史人才，功不可沒，所以基於這個標準推薦他選院士，而他也因此而當選。⁴⁴1974年，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也是

42 第九屆評議會第四次會議紀錄，評議會，錢思亮先生檔案。

43 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初稿(手稿本)》，第18冊，頁32。

44 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初稿(手稿本)》，第18冊，頁27。



第十一次院士會議院士投票情形。

以這一個標準當選院士的。其實，更早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第四屆）和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第五屆）也都是因為有這一條規定才能當選，他們的辦學治事確實成績卓著，所以也沒有人據以攻擊，可是當1972年清華大學校長徐賢修被提名為院士候選人時，就受到質疑了，他要等到七年後才如願當選（第十三屆）。⁴⁵臺灣大

學校長閻振興更是爭議人物，他四次提名，四次招致否決。

閻振興歷任高雄港務局局長、成大校長、科導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部長、臺大校長，但是大部分人知道他的，不是他在教育機構中的資歷，而是他與政治強人蔣經國的關係，認為他是國民黨政治勢力的代表。1982年他在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評議員任內第五度被提名為院士候選人，也終於獲得當選（第十四屆）。當時的閻振興不僅是行政院原子能科學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而且是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所以就有清華大學教授在雜誌上表示，讓閻振興這種「政治氣味」濃厚的「政治人」當選院士，實在不妥。⁴⁶這位清華教授宅心仁厚，只是說往者已矣，不宜再犯同樣錯誤；但是後來和李敖絕交的一位在港臺兩地專門辦政論報紙和雜誌的朋友就不客氣了，直說閻振興留美回國以後，從沒寫過一篇像樣的論文，根本是一個教育行政官僚，而這一個教育行政官僚主持成功大學校務，毫無建樹；主持臺灣大學校務，臺大倒退三十年；而主持教育部部務，更濫設五年制專科學校，貽害國家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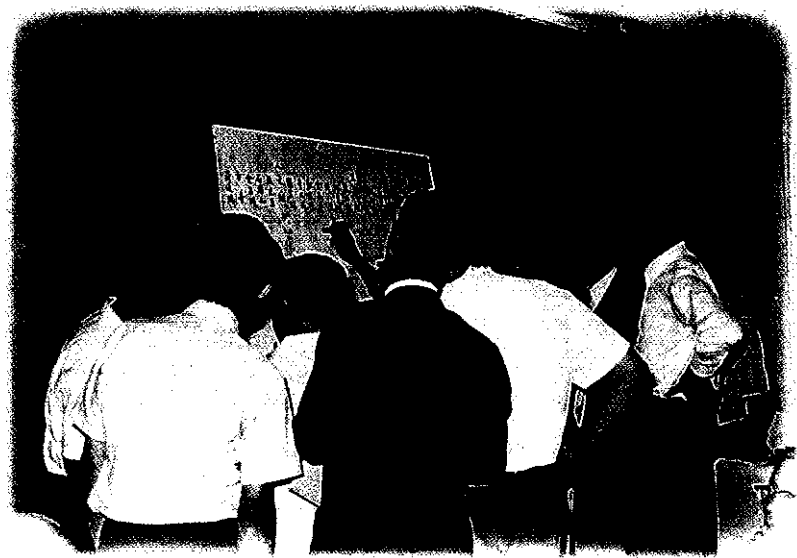
45 蔣碩傑和劉大中致李餘函，錢思亮先生檔案，1973/1/24，1973/1/25。

46 〈讀者來函〉，《亞洲人》，3：3（1982/8），頁3，作者署名為「清大一教授」。

窮；如果連這種人都可以當選院士，那是對學術與知識的無比侮辱，他不得不質問那些投贊成票的院士是否在搓圓仔湯。⁴⁷

院士是評議會提名的，但選舉是院士的職責。1957年院士制度恢復後，因為院士人數很少，所以投票不分組，當然容易引起外行不懂的質疑。其實外行不懂的結果是不願投贊成票，以致院士難產，而因為院士難產，王世杰院長在1965年把原來當選需要五分之四的票數改為四分之三，同時開始分組投票。錢思亮擔任院長後，基於同樣的考量，於1973年再次放寬院士標準，把四分之三改為三分之二；若分組投票時超過三分之二，則全體投票時只要得到二分之一的選票便可以當選了。⁴⁸採用這種投票辦法，通常只要有10位左右的院士願意支持，就鐵定可以當選院士；後來院士人數變多，便不容易了。一般說來，數理組比生物組團結，人數又多，所以

分組推薦的多半會當選；生物組則經常是分組時投票贊成，全體院士投票時卻暗中反對，結果當選的人不多。人文組也有類似的傾向，提名時礙於顏面贊成，大



第十一次院士會議院士選舉開票時，眾院士圍觀開票結果。

47 段宏俊，〈中央研究院也搓圓仔湯？〉，見於《近年來各界對本院之批評及那先生答辯書》，立法院質詢，錢思亮先生檔案。

48 〈中央研究院第五屆評議會第三次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第八屆評議會第二次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會議紀錄(民國46年至83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會投票時則根據內心意見投下反對票。另外，官場的候選人，在人文組可能會占些便宜，不過在數理組和生物組反而比較可能遭到歧視。

候選的院士只要是華裔即可，不一定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所以選出的海外院士不時有不懂國語，從來沒有到過臺灣的。投票見仁見智，當然會有遺珠之憾，但是選舉過程中有一些制度安排，確實也容易引起外界誤會。譬如推薦院士候選人時容許跨組連署，導致外界誤會留美院士包辦院士選舉，由少數學門所控制。外界尤其批評，人文組的院士是由史語所或與胡適有關的院士包辦，以致1982年以前，人文組33位院士中有13位是史語所出身，因此主張對中國歷史要有溫情的錢穆，或是治民國史被某些人認為有突出表現的梁敬錚都成為向隅之士；其他除了和近代史和人類學兩個領域有關的學者外，簡直沒有問鼎學術最高榮譽的可能。有一些學官兩棲的人物，像張其昀，對院士選舉一事，尤為不滿。前述這些批評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子虛烏有，譬如胡適院長就舉薦過錢穆，⁴⁹雖然無法在其生前說服其他院士改變對錢穆的觀感，但到了王世杰院長時代錢穆仍然脫穎而出。此外，評議會的院士提名辦法，有時流於浮濫，確實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尤其保密不足，有些不一定正確的內部討論意見，流傳到外面，對當事人還造成心理創傷。

最嚴厲的外界批評是，院士中旅居美國的占絕大數，其中擁有外國籍的尤其多，這些人對臺灣沒有感情，甚至不願意前來開會，遑論到臺灣貢獻所學了。其實這個情形從恢復院士制度以來就已經存在。錢思亮院長時代也是一樣，1971年院士有69人，其中48位旅美，2位旅港，僅19位長住臺灣；1972年，增加了8位新院士，但國外院士增加到57人（1人過世），⁵⁰始終都是海外院士居多的局面。這點尤以自然科學最為明顯。更受外界非議的是，有些海外院士形成小團體，可以輕易左右院士選舉，同時也影響本地學者的當選機會。其實，這些批評，早在朱家驊代院長

49 胡適先生檔案，館藏號：HS_NK06-014-049。

50 轉引自陳祚龍，〈低談淺論——我們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時報》，1973/3/11，1973/3/12，海外專欄。

和胡適院長的時代，都已經出現了，只是當時輿論並不注意。到了1970年代，海外院士的政治左轉，便浮出檯面。甚至有人批評海外院士，對國家連起碼的向心力都沒有，為什麼還要加以維護，何不立即做出懲罰，還有人大哉問，為什麼容許外國人當院士呢？

問題是：院士選舉一開始就強調學術貢獻。一談到學術貢獻就有國際和國內水準的差別，人文方面這點還很難說，但自然科學就非常清楚了，而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學也有同樣傾向，有客觀的國際標準存在，如果選舉院士時降低標準，會降低國際同行的評價，甚至引致已當選的國外院士的反感。1970年代初期，劉大中和蔣碩傑兩位院士主張降低當選院士的門檻，就被指責為過分從權，如果新院士的水準降低，海外院士羞與絳灌等列，將造成離心離德。他們很想提名一些國內學者做為經濟學院士候選人，但是考慮到國際水準，仍不得不提名居住國外的華裔學者。⁵¹沈君山代表政府聯絡海外學人，也有同樣看法，認為擴大院士選舉，勢必降低院士水準不可，降低院士水準，則濫竽充數，引發有成就的海外院士不齒，所以他主張不要增加院士名額，尤其反對降低院士標準。⁵²錢思亮受他們影響，也更加不願意擴大院士選舉和降低院士當選門檻了；為了堅持這一點，他接到王世濬等院士提名其公子錢煦為院士候選人時，堅決請求撤案，以免外界以有色眼鏡解讀。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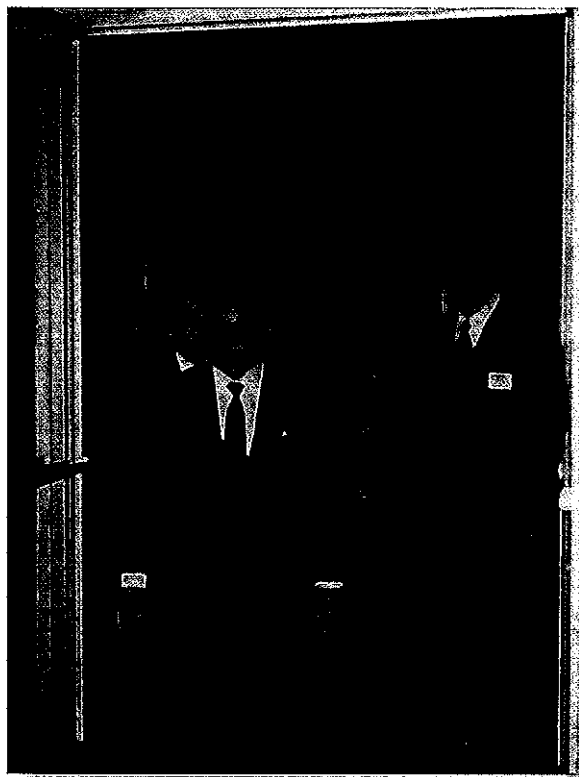
終於隨經濟發展而起飛：第一個五年計畫

1970年代的留學生是政治覺醒的一代，臺灣經濟開始起飛，同時美國的就業市場不好，有很多臺灣留學生有意回國，甚至有許多已有學術成就者也願意歸國。但是中央研究院受到預算和員額的限制，始終不能大肆引進新人。中央研究院只能靠

51 蔣碩傑和劉大中致李翰函，錢思亮先生檔案，1973/1/24，1973/1/25。

52 沈君山致錢思亮函，錢思亮先生檔案，1973/11/31。

53 錢思亮致王世濬函，錢思亮先生檔案，1974/2/1。



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左)首次蒞院參加院士會議。

著國科會和青輔會的資助，爭取一些初出茅蘆的留歐、留美學生。但是稍為優渥的待遇，也幫忙爭取到像蔡義本、張系國和趙民德這些在臺灣完成大學教育而在美國事業有成的優秀留學人才，由他們實際負責籌備地球、資訊和統計三所。

錢思亮也注意到院裡世代交替。從大陸來臺的研究人員，工作了二十餘年，都超過或接近60歲了。當時有少數研究人員因為1946年的行政作業錯誤，拿到終身可以不退休的聘書。但是其他研究人員就沒有同樣優渥的待遇了，每年一聘。1971年，錢思亮根據政府新修的法令，要求他們屆齡退休。為了因應退休潮，王世杰院長曾鼓勵各所所長提拔青壯學者擔任副所長，此時錢思亮就以他們代替退休的資深

老所長。1970年，錢思亮以凌純聲的學生李亦園接任民族所所長，1971年以李先聞的學生郭宗德接任植物所所長，1973年以魏岳壽的晚輩、臺大畢業的陳朝棟接任化學所所長，並以李濟的晚輩屈萬里接任史語所所長。儘管所長開始不分省籍的年輕化，但是在吸收年輕的研究人員方面，限於名額和預算，始終不能有太多的積極動作。有一些年輕留學生回國，受到院內主管人事單位的排拒，他似乎也沒有積極加以干預，為他們排除困難。培植年輕人才這一方面，還是得等到中央研究院第一個五年計畫提出和落實之後，才有所突破。

1974年，錢思亮召開第十一屆院士會議。這一次會議與歷屆不同。當時蔣經國剛剛出任行政院院長，他的父親蔣中正還是國家元首，只是實際上他已經是臺灣



蔣經國招待院士及其眷屬參觀十大建設並遊覽名勝。

最有權力的人了。他認為臺灣在屢經外交挫敗以後應該大力展開對海外的宣傳，而院士會議就是這樣一個重要孔道。他可能因為劉大中院士的建議，決定擴大舉行這一年的院士會議，⁵⁴不僅允許已經訪問中國大陸的費景漢院士回臺灣一年，也越俎代庖，親自承擔起中央研究院接待出席院士的全部責任。他召集十三個政府部會和其他機關的首長，逐一分配接待院士的任務。蔣經國要求給予歸國院士最隆重的接待，動員大學生提供服務，住圓山飯店剛完工的新建大廈四樓，集體活動時一定坐冷氣巴士，個人活動時則每人一部小轎車，決定回國的院士可攜帶夫人同行，由政府負擔機票和全部膳宿費用。結果有23位海外院士回國，17位本地院士參加盛會。院士會議前後，中央研究院更舉辦經濟、醫學及公共衛生、工程、數學、農業、生物學、史學、考古學、語言學等各項研討會，邀請有興趣的本地教授和學生參加；同時為了推動訊息科學研究，召開有關院士座談；另一方面，則安排經濟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和參謀總長作施政報告，並邀請院士參觀十大建設，因此院士的足跡遍及臺灣南北，從北部核能電廠到南部高雄港，參觀南北高速公路和橫貫公路、基隆造船廠和曾文水庫。對蔣經國的款待，國內外院士亦給予熱烈回報，相關的學者建議設置環境與大地科學研究所以及資訊科學研究所，並主動答應前來幫忙。⁵⁵

54 劉大中致錢思亮、蔣彥士函，錢思亮先生檔案，1973/8/25。

55 院士會議，錢思亮先生檔案。



事緩則圓



北美院士座談會。(左一為蔣碩傑、左二錢思亮。)

錢思亮對中央研究院每年有1億元新臺幣的預算，似乎相當滿意了，至少他不會想到去積極爭取更多的經費。其實從國家經濟的發展來看，1億元實在是一個不起眼的數字，當時國家的建設，隨便蓋一座橋也要1、2億元。1977年，錢思亮到美國紐約召開院士座談會，當時蔣碩傑、費景漢、顧應昌等幾位經濟學院士，便提醒他中央研究院的預算必須擴大。第二年夏天，孫運璿甫出任行政院院長，國庫更是異常充裕，蔣碩傑和費景漢這兩位有功於臺灣經濟發展的院士遂特別拜訪孫運璿，建議擴大科技預算在全國預算中的規模。⁵⁶他們認為當時發展中的國家，用在基本研究的經費都占全部國民所得的千分之一左右。當時的臺灣國民所得約7,000億元，千分之一就是7億元，但中央研究院的經費只有1億元，實在太少。但他們也認為，如果驟然把中央研究院的預算提高到7億元，也會欲速則不達，可能造成更嚴重的浪費問題，因此建議在今後兩年之內先把預算提高到3億元，然後再逐步調高比率。孫運璿對這些經濟院士本來就十分佩服和禮敬，所以對他們的建議反應相當積極，錢思亮得知相關報告以後，也極力配合，所以在院士會議期間，特別邀請與會院士到各所及籌備處參觀，並由院士提出如何擴大預算的看法，最後擬定一個五年發展計畫，請吳大猷審議，再正式向行政院提出，先把每年預算由1億元擴大到3億元。

56 陳慈玉、莫寄屏訪問，陳南之等紀錄，《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145-146。據經濟所所長于宗先院士的回憶，五年計畫的想法是他最先想到的，但得不到錢思亮的回應，就在高化臣總幹事的配合下，遊說蔣碩傑等經濟學院士，利用院士會議，改變錢思亮的消極態度。見于宗先，〈感懷過去的成長、期待未來的發展〉，頁25。

由於全院早已習慣高度的分權管理模式，每個所也不瞭解具體的情況，只知道預算會擴大，所以都針對自己的需要提出需求，院方並沒有整體的考量，就把各所提出來的計畫書和需求書彙整出來，然後加上總辦事處自己的計畫書和需求書，上呈給總統府，再轉交給行政院審查。第一個五年計畫的主要部分是，任由已存在的研究所和籌備處盡情擴展，滿足積累二十多年對硬體設備的嚴重飢渴，譬如增加員額、興建大樓、購買儀器圖書；這些經費支出的比例約占四分之三，至於直接用於研究的經費，則約占四分之一。從全院角度所作出來的規劃，主要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增購院地；第二類是資助學術機構的研究計畫、加強對國際學術團體與學術人士之聯繫，以及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第三類是興建接待學人宿舍和學術活動中心，供招待來臺學者住宿以及本院召開國際學術會議之用。⁵⁷

五年計畫提出當時，行政院孫運璿院長雖然已經決定全力支持，但是為了慎重其事，也為了確定計畫的可行性，他還是要求行政院各部會加以審查。由於此舉暗示中央研究院是行政院的下屬單位，吳大猷期期以為不可，孫運璿於是特別指定政務委員李國鼎負責評鑑，並親自前來中央研究院作實地考察。⁵⁸李國鼎是財經官僚，但是在英國研究過核子物理，也在著名的實驗室工作過，他做事十分認真，所以很快便提出了他的評估和建



李國鼎(中)在評議會中起身發言；他被譽為「臺灣財經建築師」，負責審查本院第一和第二次五年計畫。

⁵⁷ 中央研究院各研所處五年發展計畫，院士會議，錢思亮先生檔案。

⁵⁸ 吳大猷，〈我與中央研究院〉，《我的一生：學·研·教·建言》，頁139-140。

議。他認為中央研究院應有兩項未來任務：一是成為世界研究「中國文化」的中心；一是趕上科學研究的國際水準，不容國際科學界忽視中華民國的存在。他認為中央研究院雖然以基础研究為主體，但是也應該配合國家的科技發展方案，從事「有任務的基本研究」和應用研究。至於研究政策，除強調開創新領域以外，特別強調多學門以及多科際整合，特別是「自然科學間、社會科學間、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科際配合運用」。

據李國鼎的評估，中央研究院的十四個研究單位可以區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有充足人力，並有高度的研究成果者」；第二類是「已有確定的發展方向，並顯示高度潛能者」；第三類是「已有相當歷史，但發展之新導向不甚明顯，宜加檢討決定如何擴充者」；第四類是「歷史尚短但極重要，目前缺乏基本研究人力之研究所」。第一類的所，他認為有植物、動物、生化、史語和民族五所，李國鼎建議增加其中自然科學各所的預算和員額，尤其是技術員工的名額；人文社會科學各所則增加整理和保存文物的預算，加強文物展覽。他希望植物、動物和生化三所加強遺傳工程研究，⁵⁹史語所加強文物整理和展示工作，民族所擴大研究領域，積極研究社會習俗，甚至建議改名為社會及民族學研究所，特別研究伴隨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大興廟宇之風。⁶⁰第二類是經濟、數學兩所以及地球所籌備處，他主張經濟和數學兩所向地球所看齊，向應用方面傾斜，前者研究經濟發展與政策，後者研究應用數學，並以專案補助方式解決其發展困難。第三類是物理、化學、近史和美文所。原來這一類還包括數學所，經抗議後移到第二類。關於這一類所，他認為物理和化

59 植物所的遺傳工程研究是其所長郭宗德首發其端的。他1977年到美國考察，發現遺傳工程的科技雖然只有兩年的歷史，卻已成熟，可能為生物科學帶來理論和應用兩方面的革命，要求國科會發展此一新領域，但是國科會反對，中央研究院也不能提撥預算，故一事無成。1979年，因為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賜示」，才開始提出正式計畫，但是中央研究院還是沒有提撥預算，需要靠經濟部部長張光世特別補助，一年3百萬，連續三年，才開始展開學習和研究遺傳基因重組以及新物種細胞的製造。見郭宗德致李國鼎函，李國鼎先生檔案，C4-7.4，(1981/1/29)。

60 李國鼎致錢思亮函，李國鼎先生檔案，C4-7.27，1981/3/26。李國鼎評估意見被訛傳為他有意恢復社會學研究所，故致函澄清。

學兩所的研究環境不如清華和臺大，最好搬離南港院區，甚至併入清華和臺大相關科系，若要保持獨立，則物理所不要只強調高能物理，以之為重點發展方向，一定要向生物物理和大氣物理兩個領域拓展；化學所則不應該致力於臺大和清華已有相當成績的觸媒化學，而應改以有機合成為重點。李國鼎批評近史所的研究重點不明確，沒有把發展重點放在南京時代的經濟史研究、經濟有關檔案的調查、蒐集和整理，也沒有與史語和經濟兩所開展共同研究，並延攬政治、社會和法律科學的人才，從不同角度來研究歷史。他對美文所則是強調實用，回到王世杰辦所的初衷，要把研究重點從美國文化移往美國地區，從美國文學、歷史和哲學移往美國外交、政治、經濟和軍事，成為政府的智囊機構；最好更搬到木柵，與政治大學合辦。第四類是資訊和三民兩所。他認為資訊科學的研究急待發展，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在實踐中的問題固然重要，也要研究民生主義的願景，同樣重要的則是培植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人才，向研究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方面開拓議題；至於進行途徑，則為加強和各大學的合作研究。⁶¹

李國鼎對物理和化學兩所的評價不高，說它們不僅設備和人員不足，而且研究偏於理論，選題尤其不具備學術重要性。其實，在錢思亮院長任內，化學所只有10位研究人員，始終在酒精類研究中打轉；而吳大猷主持的物理所，研究人員也只有13人，主要都是與清華大學合聘，難說有何學術建樹。⁶²錢思亮看到對化學所的批評以後，臉色鐵青，但是無論人前還是私下，都強自隱忍，沒說什麼話；吳大猷硬直率性，就形於言色了，不僅私下，有時在公共場合也不吐不快，透露了一些內心的真實感覺。他承認李國鼎對物理和化學兩所的評價是正確的，但強調這兩個研究所之所以不如臺大和清華，是政府根本沒給它們應有的照顧，其實整個中央研究院

61 中央研究院五年發展計畫評估意見，院士會議，錢思亮先生檔案；吳大猷，〈中央研究院院務座談會——吳院長講話摘要〉，《教育問題》（吳大猷文選第3冊）（臺北：遠流，1989，三版），頁184。李國鼎對數學所的評價本來也很低，在吳大猷的抗議下，才從第三類改列為第二類。數學所當時有17位研究人員，但大多數在國外。數學所所長周元榮和繼任所長樊熾，不常在臺北。

62 楊翠華訪問，楊明哲、萬麗鵬紀錄，《阮維周先生訪問記錄》，頁84-85。



受惠於五年計畫的援助，終於可以大興土木打造生物院區了。圖中左為興建中的生醫所，右為興建中的分生所。

在第一個五年計畫付諸實行之前就像一個沒有爸媽的孤兒，若給予適當預算，化學和物理兩所也可以表現優異。⁶³無論內心如何不滿，錢思亮仍然責成評議會成立九人專案小組，根據李國鼎的評鑑，修訂第一個五年計畫，並於1982年開始實行。在此後五年期間，錢思亮不僅據以大力擴充物理、化學、生化、動物和植物等老所，以及地球、資訊兩個所的籌備處；並在院士會議和行政院의特別支持之下，在自然科學方面成立生醫、原分和分生三個所的籌備處，在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支持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成立。他也運用自己是中基會董事的身分，為中央研究院爭取了一些經費。

原來，中央研究院許多所因為長年缺乏經費，沒有新的研究計畫，尤其缺乏新的研究人員，像一灘死水，這時有了五年計畫的活水灌注，情況就大為改觀。各所除了編制擴大以外，紛紛大興土木工程。錢思亮也在院區附近增購土地，興建同仁宿舍，解決部分同仁的住宿困難；興建學人宿舍，提供回國學人便宜的住屋；興建學術活動中心，解決同仁的伙食問題，並提供來臺或回國的海外學人一個落腳之處；籌建古物陳列館，讓史語所世界級的珍藏文物有一個陳列的場所。第一個五年

63 吳大猷，〈我與中央研究院〉，《我的一生：學·研·教·建言》，頁148-149；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下)》，頁144-145。



有了五年計畫，統計所（圖左施工建築）也得以開始興建了；其前方當時還是農田一片，如今已規劃改建有綠地、噴水池、活動中心、體育館與人文館了。

計畫通過後，地球所興建新大樓，近史所和美文所合建圖書館和研究大樓，經濟所增建研究大樓，化學所和物理所改建大樓，民族所新建標本陳列館，陸續完工，所以從1982年以後，院區到處出現三、四、五層樓的建築，不同於以前只有一層或二層樓的模樣。

硬體改變以外，軟體有同樣顯著的進步。預算員額增加了以後，各所可以大量進用新人。1982年度，中央研究院便進用了44位新進研究人員，其中有博士學位者22人，碩士學位者16人，學士學位者6人。其中數理組博士12人，碩士5人，學士2人；生物組博士4人，碩士3人，學士1人；人文組博士6人，碩士8人，學士3人。⁶⁴這表示可以從留學生中吸收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才了，也有選送研究人員到國外進修高級學位的能力了。中央研究院1981年僅有186位副研究員以上的研究人員，不包括63位助理研究員在內；五年之後，全部研究人員增加到402人。除掉新設的三所一室以外，原有的十四個所研究人員增加至344人，其中人數增加最多的是史語、經濟、三民和數學等所，唯有資訊所因為待遇缺乏競爭力，研究人員不增反減，在短暫的發展之後，又跌進聘請不到人才的困境。⁶⁵

64 據錢思亮院長對於有關五年發展計畫前二年執行狀況之擇要報告，見〈第十五次院士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第一至二十次院士會議選舉紀要》，頁19。

65 中央研究院第一、二期五年發展計畫評審報告，吳大猷先生檔案，頁3。



五年計畫之外的生醫所、分生所和原分所

錢思亮從出任院長以後，就不斷有人建議他成立新所。院士會議建議恢復醫學和工學兩研究所，教育部和教育團體建議成立教育研究所、中國哲學研究所、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等。蔣經國總統在批准第一個五年計畫時，也要求錢思亮向新的

研究領域
進軍。1980
年院士會議
便通過了籌
建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
的案子，但
第一個五年
計畫中沒有
生醫所的影子，遑論分
生所和原分
所了。錢思
亮的公子錢
煦是生物科
學教授，父



余南庚(右一)在內科心臟學、呼吸循環生理及病態生理，都有卓越貢獻，是兩位總統的「御醫」，領導創建本院生醫所。(左起：韓忠謨、吳大猷、蔡作雍、趙沛明、余南庚。)

子兩人是否曾就成立生醫所一事詳細討論其可行性及其步驟，並不清楚。如果他們兩人對中國大陸時期的中央研究院有一些了解的話，應該知道中央研究院原有心理研究所，專門從解剖學的角度研究動物神經，後來在內戰時期朱家驊代院長也曾經委請神經生理學學者林可勝籌備醫學研究所。可是這些只是先例，現在要成立的生醫所基本上和它們都沒有任何繼承關係，其檯面上檯面下的最重要推手是余南庚

院士。余南庚是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教授，國際心臟學權威，曾任美國心臟學會會長，他是兩位蔣總統的「御醫」，曾任榮民總醫院和三軍總醫院顧問，是臺灣各醫學院爭相爭取講學的對象。他很想整合臺灣的醫學研究，但是因為無法長期回到臺灣，所以很難有所進展。

實際上把想法變成行動的是當時的國防醫學院院長蔡作雍院士。蔡作雍是林可勝院士主持國防醫學院院務時的學生，以研究腦神經著名。1978年當選院士以後，他認為臺灣的醫學院有七、八所，水準均蒸蒸日上，但每一個醫學院都有濃厚的本位主義，彼此不能合作。他認為，中央研究院如果以其崇高的學術地位，出面號召，可能成立一個全新的整合型醫學研究機構，不僅研究臨床醫學，更研究基礎和理論醫學，並包括細胞分子和公共衛生，所以構想新所的名稱時，他的建議是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Biomedical Sciences）。⁶⁶有了比較具體的構想之後，蔡作雍便和余南庚及錢煦兩位生物組院士交換意見，但是還沒有進入細節，更沒有討論到如何向錢思亮提議的問題。1980年，院士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畫前夕，余南庚私下和錢思亮以及高化臣總幹事有一些磋商，彼此決定提案設所。可是院士會議開了兩天，距離散會只有十分鐘了，余南庚還是沒有任何動作，直到蔡作雍和高化臣催促，他才要蔡作雍準備提案，蔡作雍於是在錢煦的協助下匆匆草就提案，交由余南庚領銜提出，其他院士震於余南庚的大名，毫無討論，便立即讓全案無異議通過。⁶⁷

余南庚憑藉他與總統府的密切關係，以生醫所諮詢委員會召集人的身分，為生醫所解決設籌備處的經費和人事編制問題。蔡作雍當時並不知道箇中詳情，原以為生醫所一旦正式開始籌備，余南庚一定會委託臺大醫學院的魏火曜院士全權負責，沒想到籌備處成立之時，余南庚親自出任籌備處主任，而余南庚因為自己

⁶⁶ 蔡作雍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頁49-50。

⁶⁷ 蔡作雍先生訪問紀錄，頁60。

長期待在美國，特別任命他為臺灣代理人。⁶⁸籌備處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決定新所設在何處。當時負責審核中央研究院預算的李國鼎主張依照生化所模式，設置在南港院區之外。但是錢思亮和蔡作雍都認為，如果放在院區之外，必定會遭致各合作醫院的本位主義競爭，醫界的派系主義會淆亂籌備，因此最後決定在中央研究院院區內興建研究大樓。⁶⁹

籌備處要決定的第二個問題是研究重點：余南庚本人是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的全職教授，其他諮詢委員則多半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所以諮詢委員會選擇的開會地點總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所構想的生醫所也有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影子。余南庚強調理論研究，尤其是以臨床醫學為基礎的理論研究，選擇的研究領域則是心臟血管疾病、癌症、傳染病和流行病學。因此籌備不久之後，余南庚便透過他個人的影響力，代表生醫所與臺大、榮總以及三總等三大教學醫院簽訂合作協議，在三個醫院各成立一個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可是要在中央研究院院區組建一個研究班底，實實在在進行研究，就困難重重了。蔡作雍研究神經生理，可以運用其國防醫學院的人脈，組織一個很小的研究團隊，但是無法招募到臨床醫學和其他方面研究的人才。公共衛生專家何曼德院士原曾答應幫忙，事到臨頭，忽然不願意返國，而對籌備事務轉為十分冷淡。余南庚本人也終於發現，各教學醫院既然已有研究中心，就不願意中央研究院另外再成立一個臨床研究的團隊了，何況中央研究院沒有自己的醫院，更沒有自己的病人，又如何開展臨床醫學研究？所以錢思亮在余南庚的協助之下，為生醫所爭取了一個有77個研究人員名額的編制，以後更逐年增加，但是實際上總是只有不到10位的研究人員，在蔡作雍領導之下，借別所的空間，展開對神經醫學的研究。生醫所自己的研究大樓連個影子也沒有，研究必需的儀器設備也不知道放在哪裡，如果實驗室空間的問題不先解決，則生醫所的籌備不可能有任何的進展。

68 蔡作雍先生訪問紀錄，頁61。

69 蔡作雍先生訪問紀錄，頁49-50。

1982年，第一個五年計畫終於正式開始，吳大猷在是年夏天的院士會議上建議未雨綢繆，也應該把第一個五年計畫延伸成爲一個更長遠的規劃，思考第二個甚至第三個五年計畫。這時，院士的參與興趣極高，費景漢院士甚至提議討論院士如何實際參與和貢獻五年發展計畫。他們認爲未來預算一定會有籌辦幾個新所的廣大空間，所以在院士會議上，吳瑞和彭明聰等院士聯名建議籌設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李遠哲則建議成立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當時的生物組院士認爲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一日千里，不僅已有突破領域的新觀念，也已有全新技術的發明，尤其是基因重組和融合瘤可以應用到醫學、工業、農業和能源研究，說明分子生物這門跨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的新領域，乃是生物技術的基礎學問，與資訊科學、基因科學一樣，應該同樣是未來二十年的關鍵性科技，臺灣應該進入這個新領域，籌備一個實驗室，吸引動物、植物、生化、生醫、化學和物理等所的研究人員前來參加研究，同時對其他研究機構的同仁提供昂貴和先進的儀器設備做實驗。⁷⁰

這一年年底，生醫所的經費終於有了，於是開始設計研究大樓。有了大樓的設計圖，再等到預算撥來，便可以動工了。1983年4月前後，行政院開會討論科技政策，也認爲分子生物學已經發展成爲生命科學的基礎科學，而以之爲基礎的遺傳工程，也已經成爲解決醫學、能源、工業、農業以及環境問題的未來希望所在，因此將其列爲重點科技項目。這個消息立即傳到南港院區，錢思亮遂立即以曹安邦院士爲籌備處主任和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進行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的籌備。但是還沒看到院區生醫所大樓的興建，錢思亮便溘然長逝。1983年年底吳大猷院長主持興建大樓的破土大典，1986年7月生醫所研究大樓的前棟工程完工，生醫所和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遂有足夠的空間可供延攬人才和購置儀器設備了。⁷¹後來設立臨床醫院的想法證明是不切實際，完全加以放棄，但生醫所在新籌備處主任吳成文院士

70 院士會議民國71年第十五次院士會議院士提議案，錢思亮先生檔案。

71 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正式成立後之名稱爲分子生物學綜合研究室籌備處。



李瑞則圖

1982年，第一個五年計畫終於正式開始，吳大猷在是年夏天的院士會議上建議未雨綢繆，也應該把第一個五年計畫延伸成爲一個更長遠的規劃，思考第二個甚至第三個五年計畫。這時，院士的參預興趣極高，費景漢院士甚至提議討論院士如何實際參預和貢獻五年發展計畫。他們認爲未來預算一定會有籌辦幾個新所的廣大空間，所以在院士會議上，吳瑞和彭明聰等院士聯名建議籌設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李遠哲則建議成立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當時的生物組院士認爲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一日千里，不僅已有突破領域的新觀念，也已有全新技術的發明，尤其是基因重組和融合瘤可以應用到醫學、工業、農業和能源研究，說明分子生物這門跨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的新領域，乃是生物技術的基礎學問，與資訊科學、基因科學一樣，應該同樣是未來二十年的關鍵性科技，臺灣應該進入這個新領域，籌備一個實驗室，吸引動物、植物、生化、生醫、化學和物理等所的研究人員前來參加研究，同時對其他研究機構的同仁提供昂貴和先進的儀器設備做實驗。⁷⁰

這一年年底，生醫所的經費終於有了，於是開始設計研究大樓。有了大樓的設計圖，再等到預算撥來，便可以動工了。1983年4月前後，行政院開會討論科技政策，也認爲分子生物學已經發展成爲生命科學的基礎科學，而以之爲基礎的遺傳工程，也已經成爲解決醫學、能源、工業、農業以及環境問題的未來希望所在，因此將其列爲重點科技項目。這個消息立即傳到南港院區，錢思亮遂立即以曹安邦院士爲籌備處主任和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進行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的籌備。但是還沒看到院區生醫所大樓的興建，錢思亮便溘然長逝。1983年年底吳大猷院長主持興建大樓的破土大典，1986年7月生醫所研究大樓的前棟工程完工，生醫所和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遂有足夠的空間可供延攬人才和購置儀器設備了。⁷¹後來設立臨床醫院的想法證明是不切實際，完全加以放棄，但生醫所在新籌備處主任吳成文院士

70 院士會議民國71年第十五次院士會議院士提議案，錢思亮先生檔案。

71 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正式成立後之名稱爲分子生物學綜合研究室籌備處。



生醫所研究大樓破土儀式，破土的鏟子上繫有紅綵帶，而且賓客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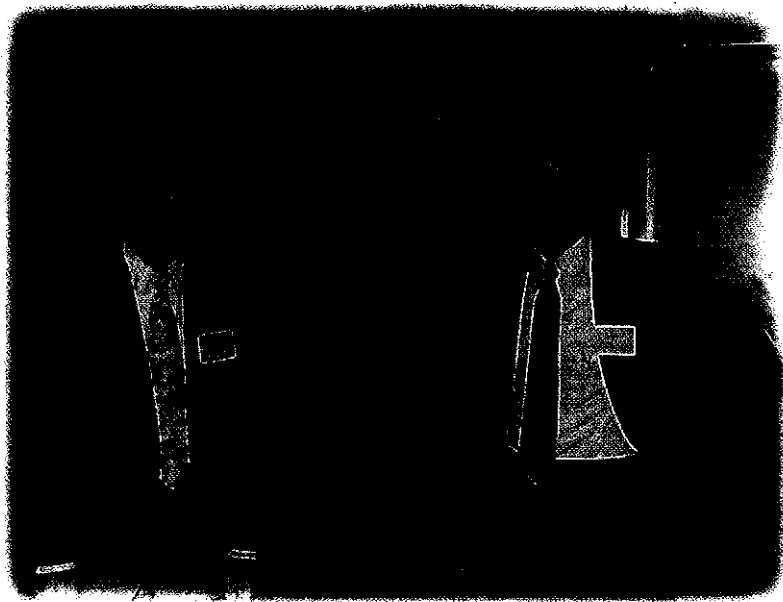
分子生物學綜合研究室研究大樓破土典禮，王偉院士為其催生並領導其成長為分生所。

的領導下，終於在1991年組織了一個有35人的研究團隊，加上近400位員工，開始根據原有計畫，針對癌症、心臟病和傳染病展開研究。只是當時專家學者組成的評鑑小組分三年評鑑生醫所，雖然都稱許其研究成果，但卻也都認為專任的資深研究人員不夠，無法形成明確的研究方向。⁷²

1982年夏院士會議後，錢思亮也立即根據院士會議的決議，聘請李遠哲為原分所諮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並由其推薦其他諮詢委員人選，以及臺大老同學張昭鼎為籌備處主任。由於張昭鼎長期在臺灣做研究，而李遠哲又說服了四位資深的同行研究人員長期回國，所以在人事上比生醫所和分生所穩定，不僅在發展生根方面平順多了，而其成果也比較快就受到國際肯定。所謂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是一門物理、化學和電子學之間的學問，李遠哲建議把最初的研究重點放在他所熟悉的雷射與分子束上，然後從雷射研究擴大到研究真空紫外線和核磁共振，再擴大到同步輻射光源。他認為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難以勝任研究工作，也不贊成直接找臺灣的博士生進所做博士後，所以利用自己的管道，先說服美國橡嶺國家實驗室的陳仲瑄和明尼蘇達大學的劉國平回國，後來又說服亞利桑那大學的林聖賢院士回來，共襄盛舉。當時最困難的問題是新所設在哪裡。物理所所長林爾康很難忘記李國鼎

72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籌備處概況，頁42，附件二至四；頁4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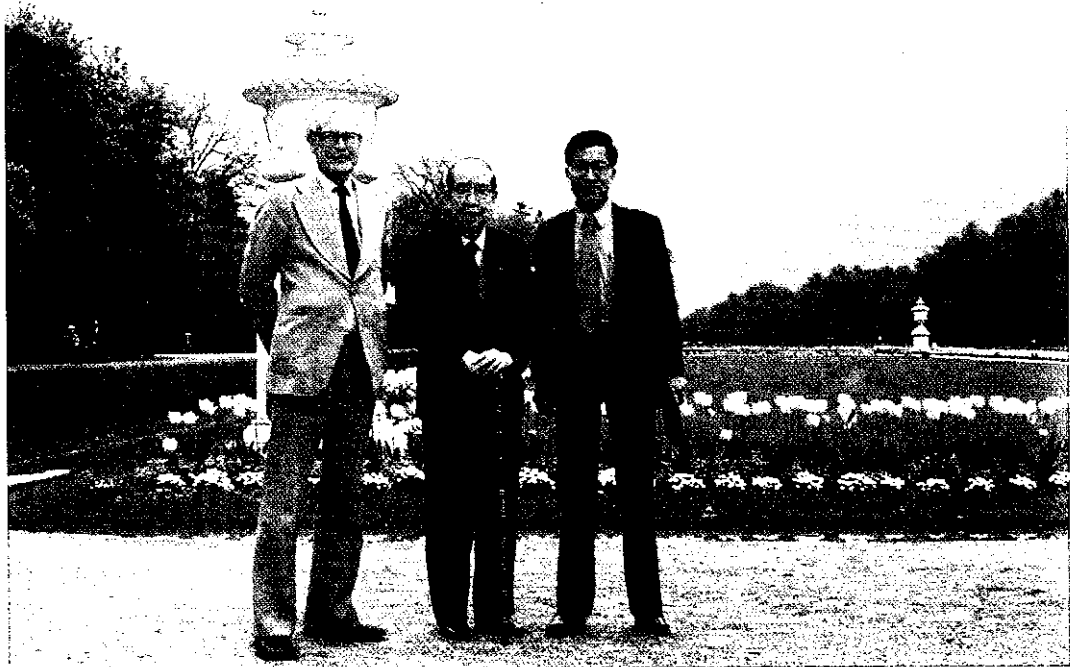
要物理所併入大學的批評，爲洗雪前恥，強力主張設於中央研究院的南港院區，但是李遠哲和一些委員從新所需要學科配合、技術支援、交通方便和研究員的宿舍，以及研究生人力等角度來看，認爲還是採取與大學合作的方式爲佳。當時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和臺灣大學得到消息以後，都極力爭取中央研究院與其合作，條件最好的是清華大學，但最後還是選擇了臺灣大學。其中最大原因恐怕有二：錢思亮是前任臺灣大學校長，他和現任臺灣大學校長閻振興已有良好的合作經驗，中央研究院已在臺灣大學校園設置了生化和地球兩所。林聖賢的評估也發揮了一言九鼎的作用，他認爲清華的師資和設備固好，但臺大學生的素質高，臺大的地理位置好。此外，諮詢委員閻愛德是清華大學教授，其令尊就是閻振興，雖然他對設所地點從來未表示過意見，但是一旦諮詢委員會作出了決定，要以臺大爲合作對象，中央研究院和臺大可能也可從他那裡得到不少暗中



李遠哲(右)在化學動力學、動態學、分子束及光化學方面貢獻卓著，是原分所成立的最大動力。(左為劉廣定)

幫助。⁷³1986年7月，原分所籌備處的實驗大樓完工，整個籌備處只有8人，包括4位研究員，2位副研究員，規模雖然不大，但是水準極高，爲臺灣的原子與分子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73 原分所，設立新研究所案，錢思亮先生檔案。



錢思亮(中)拜訪巴伐利亞科學院後，與該院院長Dr. H. Franke(左一)參訪舊宮。

積勞成疾、死而後已

吳大猷和錢思亮相交五十多年，他認為錢思亮信守學術尊嚴的基本原則，不屈服於外力，不嘩眾取寵、不冒充內行，不追求權力，不植黨營私，不苛待下屬，處事尤其絲毫不苟。⁷⁴他注意到錢思亮的謹慎、心細、忍耐、認真，但因他自己生來就沒有追求物質享受的性格，所以沒有特別注意到錢思亮廉潔從公的一面，官俸之外，分文不取，絕不營取私人利益。錢思亮像一般機關首長一樣，也有所謂特別費，但在把特別費視同私房錢使用的時代，他除了公務所需之外，全部涓滴歸公，



北美院士座談會。

每年過年過節用以酬謝同仁辛勞。⁷⁵錢思亮處事圓融，但是也正因為處處求全，而缺乏開闊的視野和大開大豁的表現，以及偉大的遠景和夢想；由於過分遷就現實，治事一以事緩則圓為原則，於是表現不出英明果斷，尤其大小事務都管，結果陷身於公牘之中，累壞了自己。

74 吳大猷，〈念錢思亮兄〉，《人文·社會·科技》，頁249。

75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下)〉，頁89；〈追隨錢院長思亮先生兩年小記〉，《錢思亮先生紀念集》，頁148。



1983年6月14日晨錢思亮院長與美文所所長朱炎(左)攝於舊金山St. Francis大飯店前，是錢思亮(右)生前最後一張公開照。



1984年9月15日，本院舉行化學所研究大樓命名為錢思亮館暨錢故院長銅像揭幕典禮。

就因為大小事都管，連例行的公文也全要親自批閱，總幹事高化臣批評錢思亮不懂得授權下屬，對下屬有時不夠尊重，因而屢屢求去。錢思亮案牘勞形的情況，到韓忠謨代理總幹事以後更加嚴重，經常下班回家以後還要焚膏繼晷，批閱公事。韓忠謨代總幹事非但不能分勞，反而遇事推諉，錢思亮因此更加勞碌不堪。當時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兩年了，預算增加三倍，院裡的大小事務至少也應該同時增加了三倍，他的體力實在不堪負荷。1983年，他以75歲高齡到歐美各國訪問46天，先到歐洲拜訪重要科學研究機構，接著回到母校伊利諾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並乘機召集北美院士座談會，每天的行程排得極滿。他的隨行秘書美文所所長朱炎比他小28歲，回到臺灣以後躺了兩天，他卻在第二天早上便應代總幹事之敦促，回中央研究院上班，滿臉倦容，毫無休息地連續工作了三、四天，到6月21日回辦公室時，精神便徹底崩潰了。秘書組主任陶英惠走進其辦公室時，但見他癱瘓在座位上，指著堆積如山的公文，問如何批閱。第二天，錢思亮就有輕度中風跡象，當天下午更住進了臺大醫院的加護病房，等病情稍微穩定以後，他看到桌上的病歷，以為又是公文，竟然向護士大發脾氣，怪他們不拿給他批閱。⁷⁶他如此心繫公事，實際卻已病入膏肓，接連發生兩次心肌梗塞，雖然均經及時搶救，卻已不濟於事，終究在兩個半月後撒手長辭。⁷⁷

76 那廉君，〈悼念錢思亮先生〉，《錢思亮先生紀念集》，頁133。

77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下)》，頁93-95。